

## 经济界

### 王三畏堂(盐业世家)

王余照,号朗云,生于1813年(清嘉庆十八年),卒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其祖先于明末清初自湖北迁居富顺县,在自流井珍珠寺建立王宝善祠,弟兄五人依年龄定其支派为金、木、水、火、土五支。王余照属木支,其兄弟三人命其堂名为“王三畏堂”,以开采井盐为业。

1838年,王余照倡议三房分居。分居后,提留的宗祠田土(包括他以之发迹的高山井、扇子坝诸地区)由他经营管理。为复淘加深废弃的天一井,他招来陕商,订立“出山约”,规定:开放扇子坝,共同凿办盐井。每凿一井,主出一井三基(井厂地基),客出押山银400两和凿办资金,将全井每月收益作30股(30天),主占12股,客占18股。客股18年期满,将井厂股份设施归还主方。天一井起推之初,月出卤水二三千担,不时自

喷卤水高至丈余,只倒悬一木盆于井口之上,卤水便顺盆而下,流入橐桶。当时卤价高昂,灶户每日订购卤水一担,即先交银100两。王余照因此致富。王余照将天一井所获利润,用于淘办扇子坝废旧井。1850~1860年,他在扇子坝自办和与人合办的几眼卤井陆续见功,如三生、金海等井所产黑卤咸量达到每碗3.3两,且曾自喷卤水,使王氏盐产量达到富荣盐场总产量1/10,居全场之首。

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淮盐运道受阻,两湖缺盐,清廷批准川盐济楚。王余照乘机开设广生同盐号,并在邓井关、泸州、重庆及湖北宜昌、沙市、洋溪设立分号,专门运销济楚川盐。在此过程中,赢得数以百万计的财富,“富甲全川”。随着生产和运销利润大增,王余照开始大量购置田土乡庄,跨富顺、荣县、

威远、宜宾数县,年收租谷 17000 余石。

1859 年冬,李蓝义军攻占犍乐盐场。富荣盐场官绅盐商以及有产者“千余家”闻风逃往三多寨避难。1860 年 4 月,王余照聚集盐商、豪绅在自流井抢筑险要堡垒大安寨。自同年 7 月开始到 1861 年秋,他率领地方团练武装据寨抗击李蓝义军达 1 年之久。川督骆秉章将其事迹上报清廷,清廷下谕表彰,并赏戴花翎。

1863 年,清廷为筹措陕甘军费,决定在盐场增抽水厘,井户每推汲卤水 1 担,征厘金铜钱 1 文,富荣大场商多系集井、灶、硪、号于一身的盐业资本集团,利害交关,因此群起反对。王余照资产雄厚,当时已捐候补道,因此成为场商领袖。经过周密策划,支使盐工捣毁水厘局,并趁势及票厘局。此案发生后,富顺知县陆玘传讯王余照。王态度傲慢,语多不逊。知县盛怒之下,将他扣押入狱。时逢南北各省遭灾,王余照捐银 7 万两助赈,清廷在他候补道上加按察使衔,赏二品顶戴及三代一品封典。朝旨既下,他头戴红顶花翎,身穿紫色朝服,由二监架设的天桥高视阔步出狱。水厘之征,只好作罢。

1867 年,王余照 53 岁,为炫耀乡里,特设寿筵大庆。云南兵备道、翰林院编修赵树吉为之撰书寿序;武英殿大学士、国史馆正总裁贾桢,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瑞常,翰林院修撰翁同龢等列名拜寿;刑部陕西员外郎赵树宜、工部主事

赵熙亮等登门祝贺。

1877 年,四川总督丁宝楨改川盐商运商销为官运商销,先后于犍乐、富荣盐场设立官运局,承办运务。这直接侵犯了大场商的利益。王余照凭着与京官的关系,不断上诉户部、都察院,反对丁宝楨的改革,以至清廷敕令丁宝楨“妥为区划,或由官运,或改官督商销。”丁宝楨复奏朝廷:“自上年开办官运,……所收税羨厘杂款至 100 余万两,商民两便。现经访问呈控各节,系富厂一二奸灶捏词耸听,意在阻挠。”丁宝楨因王余照先前阻挠水厘之征未能惩办,现在又一再阻挠他办理官运,决心严惩。于是将王余照劣迹上奏朝廷,清廷据奏,决定从严惩办,先行革职,交丁宝楨提省查办。王余照得京官密信,立即逃往他乡,经过 4 年流亡生活,于 1881 年回到自流井,不数年死去。

王惠堂,王余照堂侄,曾中秀才,例捐候补道。王余照死后,从 1885 ~ 1896 年他任“三畏堂”总理。在他任事期间,大修馆舍和新硪宅第,费铜钱 20 余万串,修承德堂大厦,费银 10 余万两。王氏各房乃分其权,以王达之、王星垣作副职,事权不相属,各置私产,骄奢淫逸。在此期间,“三畏堂”债务达 60 万 ~ 70 万两。

王达之,为王余照堂侄,例捐候补道。王惠堂死后,因“三畏堂”债务浩巨,宜昌、沙市方面主要债权人,再三兴讼,富顺知县陈某加委王达之为“三畏堂”总

理,责成整顿祠产,清偿债务,从 1897 ~ 1910 年止,在任 14 年。为了偿还急债,王达之出卖威远县和鸿鹤镇田地约 2000 石租谷。在他任事期间,“三畏堂”主要产业有:

生产方面:扇子坝地区的盐井 20 余眼,日产黑卤 1000 担左右。此外在大坟堡地区尚有几口盐岩井,月产岩卤 3000 担。五家坡、大地坡的两井月产黑卤 3000 担左右。其余尚有黄卤井生产咸度不高的卤水。主要火井有扇子坝附近的 6 口,烧锅多者 70 ~ 80 口,少者数口。此外,高山井地区的裕兴井,初见功时烧锅 240 口。竹林湾的同兴、同旺两井,上桥洒海井,均可烧锅数十口。其中同兴井复淘后,可烧锅 175 口。天然气总产量变化较大,大约烧锅 200 口左右。每年制盐 14 万多包,约占全场产量 12%。输卤设施主要是大通硃,为从事卤水买卖的机构,分设上、中、下三塘,上下塘进卤,中塘出卤,日输千余担。

运销方面:广生同盐号以运销济楚川盐,调剂金融为主要业务。每年由官运局规定销额为 72 载(每载为 450 包,每包 240 斤),占场商运销总额 42%,居

全场第一。

其商号尚有:福昌生,总号设于自贡,分号建在江津、泸州等地,主要业务是采购井灶所需大米、胡豆、黄豆、菜油等日用商品。在重庆售盐后所得白银,就近购买洋纱,运回自贡销售。

这一时期,“三畏堂”的总办事机构大柜房设金丰井,由潘仲三任掌柜,总揽井、灶、硃、号大权。潘死后,基业掌柜冯竹轩、扇子坝井灶掌柜颜葛民、大通硃的下塘掌柜欧友筠、广生同井号掌柜朱子余(后为马克明),分掌业务,人称“四大朝臣”。广生同渝号掌柜赵树垣,兼管宜昌、沙市业务,并负责对外经济活动,地位在“四大朝臣”之上。王达之每日早晨去金丰井听取大掌柜或“四大朝臣”报告,指示机宜,上午处理业务,接待外客或外区掌柜。业务规划集中在每年端午、中秋、年关,主要决定产、运、销大事。

王达之任事期间,一直为债务缠绕,迄至 1910 年病死时,尚欠债款 18.3 万余两。“三畏堂”族人已多年未能分润红息,内部纠纷愈演愈烈。虽然在辛亥革命后仍有“三畏堂”的活动,但已走向衰落的境地了。

## 李四友堂(盐业世家)

自流井(今自贡市)“李四友堂”经营盐业历史远肇明代。清乾嘉时,李氏维

基、维均、维圻和维墀四房取堂名“四友”。

道光初年,李维基赴省参加乡试,与陕西籍巨商高某相识,高某得知自流井盐业利润极厚,意欲投资盐业。李遂与高订立“出山约”,议定高出凿办资金银3000两,“四友堂”出井厂基址,共同凿办新井,井灶股份各占50%。李高合资后,陆续开办卤井7眼,火井3眼。7眼卤井日产卤200余担,3眼火井日产天然气可烧盐锅600口左右。李维基自道光初掌管“四友堂”产业,直到道光末年病故,长达20余年。这期间,他除了大力开办井灶外,还广置田产,“四友堂”原来年收租谷仅10余担,到李维基病歿时,年收租谷已达400余担。

李祥庵,李维均之子,李维基之侄。《李氏族谱》称他“颖敏、谨厚、寡言”。在李维基任总办期间,他作为助手料理盐场事务。李维基死后,即由他继任总办,从道光末到同治十三年,计有20余年。其间适逢“川盐济楚”,李祥庵在此前后先后开凿卤、火井100余眼。日产卤水数千担,日产天然气可烧800多口灶。他趁两湖淡食之际,同他的亲家王朗云以及王相荣、陈辉廷等盐业巨头合组销楚盐号,三、四年间,获得巨额利润。合组盐号解体后,又各组盐号。李祥庵组织祥兴泰,继续运销楚盐。

李德山,李祥庵堂弟,在李祥庵作总办时,他协助堂兄办事。1874年,李祥庵病死,他继任“四友堂”总办,直到1890年。李德山经手新凿的卤井主要有:大山、大源、大德、大江、顺龙、双福等

井。其中双福井与他人合资,“四友堂”占1/6的股份。此井产黑卤,浓度产量为自贡第一,日产高达1000余担。为了将贡井卤水输往自井,1876年李德山创办输卤管道——大生枳,每日输卤3000余担,大生枳主要是输送自产卤水,也购买部分卤水。在运销方面,李德山撤销祥兴泰,而在重庆新设大生厚盐号,经销楚岸(两湖)和计岸(川盐计口授盐的地区)的食盐。在綦江设大生美盐号,在仁怀设协兴隆盐号,分别运销綦、仁边岸的盐。其中协兴隆与陕帮田、刘二姓合办,李、田、刘三姓各出白银2万两。协兴隆总号设仁怀县城,从仁怀到贵阳沿途设分号70余家,经销各州县食盐。大生美总号设綦江县城,脚店(子号)也遍设綦岸(綦江为中心的川盐销区)。大生厚总号设重庆,其子号遍布计岸和楚岸。

李祥庵、李德山任总办期间,“四友堂”建立了良好的经营管理制度:

1. 管理机构,“四友堂”以井、枳、灶、号四房为基本单位,设置掌柜,分管产、运、销各方面事务。每年阴历正月十八日,总办召集四房代表会议,报告上年业务情况,清查各项账目,并决定新年产、运、销计划。而后,总办分别与井、枳、灶、号掌柜面议该房机宜和具体部署。远在重庆、沙市、綦江、仁怀等地的盐号掌柜也须在每年三四月回自贡向总办报告营业情况,商议问题,并决定新年计划。井、灶、枳、号各房掌柜以下,设管账和帮账各1人,管理财务和业务事宜;

掌柜不在时,代行掌柜职权。“四友堂”三大灶有火圈 500 口,烧盐工人 100 多人。三大灶每日需煎 3000~4000 担卤水(每担重 300 余斤),共有 1200 余人的挑卤工人承担这一繁重劳动,巨额成盐又由数以千计的担盐和盐船工人运往各地。

2. 资本流向。“四友堂”在黄金时代产运销独占鳌头,资本逾 100 万两,每年获取的利润为数颇巨,其经营管理特点引人注目:

(1)生产优于消费。尽管盐业利润越来越浩巨,李祥庵、李德山却坚持每年每房分银 1200 两,作为生活费用,分别在端午、中秋、岁末各支 400 两,平时不得随意动用营业资金。而“四友堂”账房却常常储备白银 30 万两,作为生产和运销上的不时之需。仁怀总号协兴隆,垄断了贵州数十州县食盐供应,所获商业利润难以计数。但是,协兴隆掌柜与“四友堂”和田、刘二姓议定,每 3 年请股东去仁怀算账一次,提 6 万两,3 股均分,剩下的全作营业资金。

(2)广置田地产业。“四友堂”在极盛时期的 39 年中,拥有的土地数量从年收租谷 400 石激增至 5000 余石。“四友堂”在重庆、綦江、仁怀等地的盐号,也用盐业利润大量购进土地。如仁怀协兴隆总号年收租谷(水稻和包谷)达 2000 余石。

(3)用人权术。李祥庵和李德山对掌柜人选的确定十分慎重,基本条件是

能干和忠实。人选一经确定,先试用、培养、而后委以重任。一旦任用,不轻易更换。对高级职员主要采取软的一手,收买人心。每逢下属婚丧嫁娶,急需现钱时,“四友堂”总是馈赠足够的钱财和实物,使其应付裕如。对于为“四友堂”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及其后代,更是优待备至。

李祥庵、李德山之后的总办继承人是李绍堂、李燮臣。李绍堂于 1891~1894 年继李德山作总办;李燮臣于 1894~1899 年继李绍堂作总办。这一时期,由于销岸缩小,同业竞争,家族内部腐败,“四友堂”进入衰败期。其表现是:

1. 生产锐减,运销失利,负债累累。李绍堂时,停推黄卤井 20~30 口。李燮臣时,又停推 9 口黑卤井。火井生产削减到只烧 200~300 口盐锅。李绍堂时,大生视从原来每日输卤 3000 余担下降至每日输 1000 余担;李燮臣时,每日只输卤 600~700 担。盐号的营业情况也日渐不佳。重庆的大生厚、綦江的大生美、仁怀的协兴隆,均因资金周转不灵,受到陕西票号沉重的金融压力。迄止 1899 年,“四友堂”资债两抵,尚欠白银 96 万两之巨,实际上已经破产。

2. 家族内部分崩离析,腐化堕落。李绍堂、李燮臣任总办时,一反前任只为家族办事、不置私产的作风,利用职权,化公为私,为小家庭谋取利益。于是上行下效,各房私产日增,而家族产业陷于困境。李绍堂子侄 11 人各有私人企业,

纷纷使用“四友堂”的天然气和卤水烧盐,只付少量租金,甚至分文不给。

“四友堂”弟兄子侄捐官成风,捐同知费银几千两,捐道台费银几万两。甚至“四友堂”在仁怀兴隆总号的掌柜杨渊麟也擅自用号银10万,捐了贵州道台。捐官后,又要维持与官阶相应的排场、享受。李绍堂的儿子李笔春和李裕如均捐道台,挥金如土,为闻名一时的公爷。李笔春以道台资格长住重庆,与地方高级官吏往来应酬。只要高兴,随时赠人白银3万、5万两,全不在乎。内江人罗思齐对李笔春曲意奉承,先后得到李馈赠的白银几十万两;随即在内江、泸州、合州、重庆和成都5地,开设质当5家。李祥庵妻和李德山先后死去,两场丧事所费,各为数万两。“四友堂”一族数十人,每人都自持家资百万,任意挥霍,纵情声

色,一年365天,天天都像过元宵佳节,夜夜六胡、朝朝大烟。男人在滥赌嗜烟之外还广取妻妾,浪迹花街柳巷。

李星桥,1899~1911年继李燮臣为“四友堂”总办。他上任时,继承债务96万两,族人侵吞产业,账房空虚,入不敷出。他采取各种手段,力图挽回这个家族已经败落的命运。他与族人立下规矩:除每房每年支银1200两外,不得格外支取,私人租佃“四友堂”火圈卤水,必须付租金、卤价。他加凿正龙井成功,新获天然气可烧盐锅300余口;整理仁怀协兴隆业务,撤销该号掌柜杨渊麟,并追索捐官耗银10万两。但是,他没有能挽回“四友堂”的颓势。1911年,李星桥不得不在族众面前,交卸了“四友堂”的大印。

### 颜桂馨堂(盐业世家)

颜昌英,字厚庵,号鹤龄,1789年(清乾隆五十四年)生于自流井马冲口。1820年与长兄昌训开始措办永兴井,1825年井成,水火(卤水、天然气)并出,煎锅300多口,最盛时达800口,为颜氏家族奠定了发展基础。

1828年,长兄昌训病故,颜昌英独揽家族企业大权,先后措办北海、来龙井。1830年,颜氏三兄弟分家,永兴井

为三房共有。颜昌英熟悉钻井技术,善辨地质岩层,数年内先后在马冲口、周家冲、杨家冲、马草山铤井数口,一一见功。其弟颜霁廷在马冲口、杨家冲铤井亦见成效,从此三房皆大富,成为自流井盐场王、李、胡、颜四大家族之一。

咸丰年间,为避太平军袭击盐场,颜昌英与亲朋好友集资,在富顺、威远、内江三县交界处的牛口山建寨,历时7年,

耗银7万余两,筑成川南寨堡之冠——三多寨。因颜昌英的宅邸为全寨之冠,大门庭院内左右各植丹桂一株,取“桂子流芳”之意,故名桂馨堂,人称“颜桂馨堂”。

颜昌英常与族侄颜蕴山切磋铗井技术,筹办新井,并转向贡井地区投资,购买基地,先后买下从贡井大桥起,沿河上溯到筱溪街尽头一带井地,铗办黄黑卤井多眼,在伍家坡、张、姚二山、艾叶滩铗井十数口,加上自流井马冲口盐场原有各井,共140多眼,日产卤水曾达1000多担。颜昌英将盐场内部井、笕、灶、号四大部门,分别独立,在伍家坡设“四海”总柜房,管理贡井盐场全部业务。

此时,颜昌英年事渐高,遂决定将家政、产业交儿辈掌管。长子怀德,字晓

帆,人称小诸葛,16岁佐父理事,井井有条,年未30而继任永兴井总管,并总揽内外大事。四子怀惺长于外交,熟悉官场,专管盐号。五子怀恩住五家坡“四海”总柜房,坐镇总理贡井盐场。

1871年,颜昌英病逝。全家居丧成礼,子孙庐墓守制,长期没有过问盐务。盐号员司良莠不齐,玩忽职守、中饱私囊,导致井灶停业,牛只死亡,新井未铗,旧井老化,四海总柜房也成为空架子。长子怀德自总揽业务以来,内外操持,因积劳成疾,于1873年去世。其后由颜觉吾、颜辉山、颜紫澜先后主持家政。

颜桂馨堂最盛时期,拥有百万银两家产。1905年分家时,五房人平均分地租60石以及残基废井若干眼。从此,兴盛80余年的颜桂馨堂就此告终。

### 胡慎怡堂(盐业世家)

胡礼纬,江西卢陵(今吉安)人,清嘉庆年间与族人胡仕云到自流井经商,娶妻生子。礼纬死后,子元海随胡仕云回江西原籍。后由族人资助又到自流井谋生,在新街五星店购置店房,开设元和布店,人称胡元和,娶妻王氏。因善于经营,盈利倍增。

道光年间,胡元海与人合资经营盐业,获厚利,随即筹资在荒坡河埝中开凿盐井,水火两旺,获利甚丰。为便于经营

管理,在寨子岭下修建盐业总柜房,并将全家迁来贡井。

胡元海经营盐业的独到之处是“以井创井,独资经营”。其优点在于自卤自煎,缓急自如,事权统一,无股伙之间的繁琐纠纷。办新井时,可将甲井盈余作乙井开凿之资,成功则利加利,失败了只当甲井未获利而已。胡元海善于用人,他三女四子,三个女婿都很有才干,对他极其忠诚,有“胡元海窝子班”之称。

其长子胡勉斋勤奋好学,13岁随父习商,深得其父言传身教。胡元海死后,勉斋继掌家业。在经营中融产运于一体,十分重视开办井灶,以淘旧井和镗新井并举,扩大瓦斯卤水来源,竭力开拓市场,乘川盐济楚之机,兼营运盐业务。胡勉斋经营得法,获利倍增,于同治末期,增建住宅,取名慎怡堂。1892年胡勉斋去世时,胡慎怡堂的盐卤火井已增至11眼,推卤水牛500多头,租谷5000余石,运盐资金及现银30多万两。

胡勉斋死后,次子汝修主管家族企业,堂弟胡树良为助手。两人协作甚笃,家业日益兴旺。后调用重资开凿火井,深凿黑卤井,改进生产技术和设施。此外,还改进制盐方法,提高原盐质量,并

用继成井天然气煎制质佳巴盐。胡汝修又为慎怡堂制定了经营规矩,使慎怡堂在管理和经营上都有了更大的发展,成为自流井盐场王、李、胡、颜四大家族之一。

光绪年间,胡汝修结识赵熙,并与其联姻,关系极其密切,胡氏家族弟兄子侄纳款捐官,顶带相望,冠盖云集。

胡氏以巨资捐官,又营造华屋,挥金如土,原有积蓄消耗殆尽。1913年,胡汝修委家政于兄子胡孝先及长子胡铁华。此时胡氏家族矛盾日深,孝先掌管家政不久即按五房分产。胡铁华又不善经营,胡氏四代经营的盐业大家族,终于逐渐衰退。胡孝先于1949年病亡,家境已完全衰败。

### 吴景让堂(盐业世家)

吴景让堂是吴子春弟兄聚居于乐山盐场的一个家族堂名,亦乐山地区较大的家族财团。其祖辈吴德嵩于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从湖南省常宁县逃荒来四川,佣工于五通桥余姓灶主,因年幼诚朴,被收为学徒,在年期满,升为管事,并招之为婿。生五子,长名金三。1863年其岳父身死,吴德嵩以所分酬金买得一户井灶,名德兴提,月可产盐80担(每担重100市斤)。日常亲率五子同操井灶劳作,略有盈余扩充业务,又置五福灶,

月产盐增至百余担。

吴德嵩于1884年死后,五子分家,吴金三所分井灶,由妻王氏执管,分身营谋他业,数年中添置福星临灶,月共产盐500担。所生六子,名鼎臣、功辅、相臣、焕奎、子春、亮臣。吴金三于1907年死后,由吴鼎臣继营父业,又买入大旺、五洪两井,增锅10余口,已称富裕。吴鼎臣喜文墨、善理财,处世广交游,与嘉定知府福润和乐山知县周延华交厚,被任为“乐厂盐总”。执事期间,新建住宅一



院,弟兄聚居,由福润题名“景让堂”。吴鼎臣卒于1913年,吴焕奎继掌业务。以其性好文学,醉心诗赋,寄情书画,不善治产,两年期中仅袭父兄余绪,萧规曹随,无所增益,让由吴子春接替。

吴子春执事32年(1915~1947年),除一手整顿父兄遗业外,大肆扩张井灶和其他行业,先后发展到5灶、22井,煎锅73口,月产盐60000余担,占乐山盐场总产量1/6强。并设盐号综揽自产盐运销。又以余资插手其他工商行业,如:肥皂厂、绸缎庄、百货店、煤矿、锅厂、药号等遍布于成都、重庆、南京和上海各地;并广置田产房舍,年收租谷3000余石。时称“财逾百万,富敌一方”。在其手中建立了大丰公总管处,统驭盐煤和其他企业共43个单位,以及田庄房产等。所营各业相互依存,调节盈绌。吴子春集权指挥,事必躬亲。每晨先走遍近地生产场所,掌握情况;再分定时日去稍远井灶检查进度。不时约集管事、工匠研究技术和设备。每月考量卤咸,视其变化修订相应措施。规定所有厂号按日发送电信表报,反映业务动态。由于信息灵通,赢得经营主动权。

吴子春因嫌旧井卤薄咸轻,立志自凿新井别寻浓卤。在没有科学仪器仅凭目测口尝的条件下,踏勘至尚未开发的浸水坳地带,盖因一般人狃于习说,以该地草木茂盛,不现卤气,故无人在此开井。吴子春审度形势,认为习说不可靠,决定就此开办四眼井。从开凿之日起每

天亲自检视岩屑,分析沙口,研究变换使用工具。经过3年时间钻进,于1917年凿成见功,是为乐山盐场称著的卤丰咸重上等井。

吴子春欲求燃煤自给,于1935年开办煤矿,苦于外行,投资很多无成效,朝夕冥思,竟默悟出一个“隔山抱蛋”遥控指挥的土法。利用阡葬的罗盘按盘面所刻五行八卦和六十甲子的交错数位,命人从矿外到井内测出坑道方向,窝路远近,堂子高低,绘成《剖画图》,据图对照邻矿炭头,研究掘进措施,经年多倾注,终使一口行将报废的老矿开成见煤,产丰质优,除保证自需外,尚以余煤供他厂。

吴子春用人要求严格,待遇从优,对于干材的选拔,首要具有丰富的生产知识和技术特长,并熟悉各地厂号业务。精通账目文墨之人,经多方考验,确认可靠,即予以充分信任。对高级职员尤加优礼,尊称为伙友,逢年遇节分享红酬,告第回家,厚赠钱财或衣棺。每年中元节,对已故职员和技工设立灵位,焚化纸帛,用此市惠感动在职者为之“忠心不二”。

吴子春素习医卜星相和营造之学,因之作了些地方公益。如:遇穷人患病,为之义诊配药;夏秋防疫施药施茶;朔望年节施米施钱;倡办救济院抚恤孤老贫寒;议设康济仓防天灾荒年;捐资办消防以备不虞。还亲身施工修建晏公祠、犍乐井仁盐场整理会会址及牛华学校等。

此外,曾以其机智手腕巧用“川汉铁路公司”的贱价股票以之抵偿该公司贷款,不仅卸去了债累,与拖欠户比却显“开明”,受到当时政府奖以“不苟取、不苟得”褒扬。1923年被遴选为四川省谘议局议员,并任乐山县议会议长,乐山盐场评议公所议长。1927年受委四川省善后督办公署顾问。

吴子春在事业上虽然经营有术,成为乐山盐场首富,并有较高的社会声誉,但随之而发生的家庭矛盾则无力缓解。1937年子侄孙辈共谋分家,吴子春已临强弩之末,绥靖无策,迫而析产为五,由

子侄孙辈各自执管。但分家未及三载,以不善经营即告2/5业产易姓,仅存分化后的三份,而到1949年亦已奄奄一息。建国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受到重点扶持始得复苏。吴子春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说服子侄三家,连同长子吴鹿革独营之井灶一并组成“民生集体制盐厂”,由吴幼春任经理。这是犍乐盐区首家走向集体道路的企业,起到了示范作用,创造了合营条件。吴子春终于1956年亲眼看到手创的井灶企业和其他工商行业进入了公私合营,得以瞑目而逝。

## 李耀庭

李耀庭,名正荣,云南恩安县(今昭通)人,生于1836年(清道光十六年)。幼时家境贫困,10多岁便出外谋生,开初当脚夫,为人运送货物,往来于川滇道上。1856年参加镇压云南杜文秀起义,以作战勇猛,任过游击、都司。后以战功,获“即补县正堂”功禄,改捐郎中,封孝义大夫。

1865年,李耀庭弃军从商,在川滇道上贩运货物,做起马帮生意。稍后,与他人合作,在叙府(今宜宾)开设荣茂公商号,因业务不景气,亏累甚巨,于光绪初年歇业。1880年,李耀庭来到重庆,进入云南巨商王兴斋经营的天顺祥字号

经商,因其精明干练,深受王的器重。随业务的发展,天顺祥陆续设立了北京、上海、汉口、江西等分庄,与官府、商场来往日益增多,每年滇省官兵的俸饷银60多万两,也由天顺祥领汇。从此,天顺祥已由字号发展为票号,经营汇兑、盐岸、解协饷三方面的业务。李耀庭先由王委派至汉口、上海调查生意行情。不久,王兴斋返籍奔母丧,委托李耀庭代理渝号内外事宜。后王兴斋因事留昆明,便以滇号总理各埠事务,以渝号为分号,由李耀庭任渝号管事,分理下属各埠事务。渝号实为天顺祥的业务中心,李耀庭成了天顺祥的实际经营者。

在李耀庭的主持下,天顺祥渝号添办了滇边各盐岸,接洽官商各界,号局日盛。1902年岑毓英之子岑春煊调任四川总督。李耀庭在镇压杜文秀起义时,曾与岑毓英换帖为兄弟,岑春煊到重庆,径去天顺祥拜会李耀庭,李身价日重,人称在野“相父”,天顺祥更加得到官府支持,营业蒸蒸日上。在办理公私汇兑业务方面尤为兴盛,藩库、盐粮各署、书院等的公款,商行店铺的营运资金,都存入天顺祥,凡协饷、丁银、丁赋均归其专办。上京赴考的、进京公干的,所带盘费,都由天顺祥汇去。富家捐官,卸任官吏解银回家,天顺祥也为承办。吞没其无人收领的款项,亦所常有。特别是中法谅山之役,筹垫饷粮;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又收存出逃王公银款,贱买逃者的财物,均获利甚巨。慈禧太后出逃西安,天顺祥以大笔银两相助而增加了政治资本。此时,天顺祥的业务机关几乎遍及全国,在香港、海防也设立了分支机构,成为南帮票号的佼佼者,堪与三晋巨商相匹敌。

至光绪末年,经济形势急剧变化,钱庄、银行等新式金融机构相继出现,票号式微。1903年,王兴斋去世,王、李二家渐生裂痕。天顺祥格局变化,业务大不如昔,各处多有亏空,元气大伤。1911年,王、李二家派人各分号结账,结一处收一处,煊赫一时的天顺祥到此基本结

束。

李耀庭经营天顺祥,积聚了大量财富,他自己经营的祥发公盐号,也积攒了不少资金,随民族工业的逐渐兴起,他就由商到工,兴办实业。1899年至1900年间,在蓬溪设立顺昌公司,试开石油,经营几年,颇见成效。1907年由其长子李湛阳与他人合股在重庆创办烛川电灯公司。1909年由其次子李和阳与人合资办潼川锦和丝厂(后改名为锦纶丝厂)。他还投资自来水公司和川江轮船公司,并在渝开设了信记钱庄,发展新式金融事业。李耀庭来重庆不到30年,已成为屈指可数的百万富商,当上了云贵公所的会首。1904年,重庆设商务总会,李耀庭被推为首任总理,成为重庆商界领袖人物。

1897年宋育仁到重庆创办《渝报》。宣传维新变法,李耀庭捐款支持。他所主持的重庆商务总会也办起《重庆商务公报》,鼓吹发展实业,抵制洋货。李耀庭的两个儿子参与辛亥革命也得到他的支持。

李耀庭晚年,将业务交由次子李和阳管理。在城西鹅项颈修造了一座幽雅的别墅,定名为“礼园”(今重庆鹅岭公园前身),以娱晚景。1912年,李耀庭病逝于重庆。

## 陈洪义

陈洪义,又名陈鸿仁,外号陈跑通,綦江县人,生于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是清末民初西南地区规模最大和享有盛名的民间运输行业——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创办人。他家境贫寒,幼年即帮人放牛割草,父母去世后,生活艰难,流落县城以苦力为生。20岁时,曾在綦江、重庆抬过街轿子,后在川滇上当脚夫,因肯卖力气深得夫头的信任,作了小夫头。他为人耿直,断事公道、乐于助人排难解纷,有“乡约”遗风,又因他面麻,人们便呼他为“麻乡约”。

清同治初年,陈洪义首先以麻乡约为招牌,在重庆开设轿行,招徕轿夫,经营大帮信轿业务,人称“信轿帮”,主要经营长路轿子及城郊过街轿子(又叫溜溜轿)。为了开展业务,他与当地夫行、码头和商号建立了联系,为客商代雇轿马夫力,运输货物行李和捎带信件。当时川滇道上交通不便,陈洪义开办跨省的长途客运后,解决了文武官员上任、考生应试和民间商旅往来的困难,因而生意兴隆,得到各界人士的称许。为了适应运输的需要,他在川、滇、黔交通沿线的主要城市设立了轿行,在重庆至成都的东大路主要城镇设立了轿子分行或分铺。上述机构的建立为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光绪末年,麻乡

约轿行还举办国际客运。当时由缅甸、安南(今越南)前来中国内地各省的商旅,一般取道云南迤东经四川或贵州进入内地各省,陆路除少数乘马外,多数乘坐轿子和滑竿。这项业务,几乎全由麻乡约轿行所承揽。

在清代邮局未建立前,民间的信件均交由民办信局递送。陈洪义发觉经营这种业务,既能得到信资,又可得到“赏银”(收信人给的酬劳),是一项无本生利,十拿九稳的生意,于是他在昆明开办信局业务。为了打开局面,他针对当时云、贵、川三省的盐商和银钱帮的信函往返多由马帮运送,商情信息和银钱汇兑不及时,影响商业资金的周转,采取增加信递班次和组织专人快速递送的办法,争取了大部分递信业务。与此同时,他还承办银钱信汇和互相打兑业务,解决了客商比期支付银根紧张的困难。他的这些做法,得到各地商号、票号、盐号的欢迎,从而信汇生意日渐发达。为了扩大业务,1866年,陈洪义在重庆设立民信总局,其后又在成都、嘉定(今乐山)、泸州、打箭炉(今康定)、贵阳、昆明等城市设立分局。1882年在云南布政使唐炯的支持下,承办官署公文寄递和公币、协饷的运送。由是麻乡约的信誉日隆。从同治末年到光绪初年(1874~1876年),麻乡约

民信局每年办理银号、票号、商号所寄递的汇票和现金数目,最高时达 300 余万两白银,陈洪义从中获得的汇费收入达 3 万多两。1897 年,清政府在四川设立大清邮局,对民办信局采取允许存在,相辅而行的政策。麻乡约民信局因信件投递快速,包裹寄费低廉,业务仍兴旺发达,而与官办邮局相抗衡。

陈洪义有鉴于重庆是水陆交通的重要商埠,他在设立民信总局的同时,又在重庆开设麻乡约货运行,以重庆为中心,各地民信局和轿铺为网点,承揽货运业务。对所承客商的货物,除天灾人祸外,一概负责赔偿,从而取得了客商的信任,大批货物接踵而来,业务蒸蒸日上。随着货运业务的发展,他先在重庆、昆明、贵阳、成都设立了货运总店和分店,继后又在云南昭通,贵州遵义,四川的綦江、泸州、叙府(今宜宾)、梁山(今梁平)等水陆码头设立分店。1877 年,唐炯出任云南矿务大臣,又将东川的铜、个旧的锡交陈运输,他利用官府的支持,发展国际运输。光绪末年,麻乡约将承运的丝、茶、工艺品等从昆明经个旧、河口等地运到越南;还将同类货物从昆明经楚雄、保山等地运到缅甸。

陈洪义在创办、经营麻乡约大帮信轿行、民信局及货运行的过程中,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管理办法。他不直接掌握散居各地的夫头,而是依靠夫头为其组织运力。他业务最盛时,拥有夫头 120 余人。这些夫头平时与陈洪义保持联系,

承运货物时,由夫头雇用二把手和招来脚夫。他们之间是层层负责的伙伴关系和承托关系。他对夫头的管理,是制出名牌,排成次序,轮番领运货物,从而组织起交通沿线数以千计的力夫,保证了运输任务的按时完成。陈洪义对行内管事、司账、夫头、轿夫等各类人员的任用,根据经营业务,提出不同的要求并给予不同待遇。他十分重视运输质量,对承运的货物,都按不同物品和规格进行改件打包。货物的包装封皮,除用油纸、革席、篾席、麻袋外,有的还加盖斗笠,以防雨淋受潮。他守时守信,坚持责任赔偿,还为客商提供食宿方便。在对外关系上,为使运输畅通无阻,避免各方面的阻挠和刁难,他平时尽量结交地方官吏和社会上各种势力,遇到发生运输事故时,易于请他们排解处理。

陈洪义认真负责便利客商的经营作风,使他赢得了盛誉,成为当时同业中首屈一指最有威望的一个民间运输行业,一直被推举为重庆信轿帮首事。由是,声誉遍及西南。

陈洪义在经营麻乡约大帮信轿行期间,从夫子挣来的力资收入中,提取 6% 以上的抽头费(手续费)而发财致富,积累了巨额资金。他把这些钱财大部分用于在重庆、綦江等地大量购置田地和房产。

陈洪义于民国初年去世后,行内业务由其继室继续经营,后又顶租给他人经营,业务逐渐衰败,延续到 1949 年止,共历 87 年之久。

## 樊孔周

樊孔周,字起鸿,生年不详,华阳县(今成都市)人,曾习科举,为增生。受维新思想影响,弃学从商。1884年,与高石铭在成都学道街创设书店“二酉山房”,直至清末,陆续出售《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宣传反清意识的禁书以及《天演论》、《民约论》、《新民丛报》、《民报》等新籍时报,吸引了四川法政学堂、四川高等学堂学生前往购书阅览,对于传播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和反清革命意识,启迪青年的政治觉醒起了不小的作用。

1905年,四川成都总商会成立,由各行帮遴选会董20人。樊孔周以图书帮帮董身份,充任总商会筹备人及会董。1908年又由四川通省劝业道周善培荐举,任成都总商会协理,襄助推行“新政”。是年底,又担任成都商界组织“商事公断处”评议员。

为提倡实业,樊孔周倡议成都总商会出面,约集商界人士,组织“成都建筑有限公司”,集股修建“劝工场”。众推樊孔周为筹备负责人并草拟集股章程16条,其中规定“本公司不纳非本国人或与非本国人有关系之股”。公司集股银4万两,选定总府街与华兴街间地皮,于1908年7月正式动工,次年4月22日建

竣开场,实耗资5.3万余两,更名“劝业场”。场内共有店铺150余家,集中省城工商精华,荟萃各地名优特产,既营零售又兼批发。开场第一年,全场各业交易总额即达银33万余两,次年又增至46万余两,并改名“商业场”。樊孔周还集股两万两,在建筑公司内增设电灯部,从上海购回40千瓦直流电机1部,建立“悦来电灯厂”,后改名“同益电灯公司”,发电供劝业场之用,是为成都民用电灯之始。

樊孔周又创立“悦来公司”,自任董事长,集股银2万两,兴建悦来茶园(位于成都华兴街老郎庙侧,今成都锦江剧场地址)和悦来旅馆(位于成都商业场东面支路)。茶园于1909年建竣,先后接纳京戏、川戏和改良川戏各戏班轮流上演,遂为成都川戏的一发祥地。旅馆亦于是年5月开张,内部设备齐全,可接纳旅客近百人。

除劝业场、悦来公司外,樊孔周还创办和参与经营了下列企业:

一、因利利织布厂。1908年在成都燕鲁公所创建该厂,有资本1.5万元,织机40余台,采用新式工艺生产提花棉布、绒毛面巾和五色被面。辛亥革命后,该厂有所扩展,工人曾达300余人。

二、昌福印刷公司。1910年樊孔周集股三万元创办,并任公司总理。辛亥革命后扩展为四川第一家设备完备的印刷厂。

三、信立钱业有限公司。原由职商李念祖办于1907年,后由成都总商会总理周祖佑经营,旋因资金短缺,便推选樊孔周“担任副董共襄其事”,存放商业款项,是为成都地区第一家具有近代银行性质的私营金融组织。

樊孔周创办近代企业的一系列活  
动,对于清末四川民族工商业的勃兴有较大推动作用,他亦因此成为四川工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并日渐热衷于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活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后,樊孔周列名保路同志会,“演说罢税罢粮以激励群众”。同志军大起义后,他又邀约知名绅士,在商会聚议四川独立之事。

辛亥革命后,樊孔周担任成都总商会总理,主持商会工作。一面继续致力于发展工商业,上书当局,擘划在四川“兴办工厂,开发水利,筹设银行,兴建交通”的实业计划。一面积极从事报界工作,参与政治活动。1912年被选为四川省临时参议会议员,并在临时参议会开会期间,创办了成都第一家晚报,揭载议会消息。同年,樊从廖用之手中接办《四川商会公报》,改名《四川公报》,旋与《中

华国民报》发起人汪象孙协商,合并两报,取名《国民公报》,由汪任总理和总编辑。次年,樊仍恢复《四川公报》,评论时政,颇受读者欢迎。1914年,樊孔周又筹办半月文艺增刊《娱闲录》,于7月15日正式出版,邀请吴虞、李劫人等知名人士撰稿。1915年10月,因官方发行一报亦名《四川公报》,遂改所办《四川公报》为《四川群报》,于10月6日正式出版,改刊《娱闲录》于该报附张。

此时,北京“筹安会”组织所谓“国民会议”拥戴袁世凯称帝,通电各省商会选充代表。樊孔周回电虚与委蛇:“全国同意,本会同意”。用意颇深,可作两释:第一全国既已同意,本会自然赞成;第二必是全国同意,本会方才赞成。陈宦在1915年“双十节”期,戒严全省,大捕党人。樊书对联讥讽:“庆祝在戒严期间,半是欢欣,半是恐惧;言论非自由时代,一面下笔,一面留神。”因表达輿情而被广泛传诵。

1917年4月,川军刘存厚和滇军罗佩金在成都发生巷战。樊立率成渝商学各界代表通电全国,反对军阀混战。旋因公赴渝,要求制止川军第三师违章抽收盐税,卒为三师军人所嫉恨。6月9日,被三师暴徒枪击于简阳县施家坝,身中8弹而死。事后,成都各界为之举行追悼会。

## 温友松

温友松,名仁椿,回族。1867年12月22日(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生于巴县。1889年考取秀才。1893年赴成都考举人,因近视戴眼镜遭到学台训斥,未参加考试便拂袖返回重庆。从此他痛恨清朝官场制度腐败,以教书为业。

清末,反清的革命怒潮在全国各地兴起,温友松开始接受新思想,与本地士绅创办开智学堂;和来川的日本人经营友邻火柴公司,试图以教育和实业救国。1908年加入同盟会。同年,创办惠丰制革公司,生产皮鞋、皮包等日用品。他还投资经营川江最早的轮船公司,有“蜀通”、“蜀亨”等轮船。

1907年,同盟会员石青阳于重庆南岸界石乡筹设蜀眉丝厂。由于他奔走革命,丝厂成效甚微。继有合川张明经在重庆磁器口设恒源丝厂,甫经设置,即被火焚。由温友松将丝厂全部接买,加以修整,并从宁波聘请技师乐阿英夫妇来重庆,负责安装机器和缫丝的技术训练工作。温见缫丝有发展前途,于1910年又重新建设,扩大经营,改名为旭东丝厂。后他又创办分厂。所生产的生丝送巴拿马万国赛会展出,获特等奖,为四川丝业在国内外创出良好的信誉,并打开了生丝销售的国际市场。

1911年11月22日,重庆同盟会发

动起义,温友松得通知后,荷枪实弹,与石青阳、卢汉臣等加入战斗的行列。辛亥革命后,温友松被推为重庆公断处长。后又先后当选为重庆总商会副会长、会长。温友松为了发展商业,将重庆旧府台衙门改建为总商会会址,又修了商业场,创办了商业学校。1914年,他出资创办《商务时报》,聘请办报能手周家桢主持报务。《商务时报》经常发表揭露军阀部队罪恶行径的文字,引起了军阀的痛恨,要对作者蓝锐甫下毒手。温将蓝藏在家里,才幸免于难。温友松常年忙于商务,应酬各方,代人排难解纷,但他一有余暇便抽空读各种书籍和报刊。他的住宅“荆园”有数间书库,放置大量藏书。

1917年以来,四川形成防区制,军阀混战连年不断。重庆是四川的重要商埠,是军阀必争之地,进进出出重庆的四川大小军阀和入川的滇、黔军阀,要筹款、筹饷和筹开拔费,名目繁多,层出不穷。重庆工商业负担的苛捐杂税十分繁重,商民不堪其扰,各行业的工商界人士都希望总商会出面应付各路军阀,以维持重庆工商业的发展。温友松身为商会会长,担此重任,出面应付。特别是滇、黔军与川军开战之前,局面更为混乱,军阀部队不断向商民提出筹款,若不答应



便以军队要自由行动相威胁。温友松为使重庆市面免遭抢劫和磨难,每天在“荆园”住宅,大摆宴席招待各军将领,以联络“感情”,请各部长官维持地方治安。同时也筹划部分款项分交各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温友松积极推动重庆工商界投入“五四”运动。在温友松主持下,重庆商学联合会拟定了联合会的简章及附则8章,共12条,向全国发出通电。7月7日,商学联合会又在总商会开会,作出了重庆商学联合会抵制日货详细办法决议案,把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推向高潮。在这一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华商收回了裕丰轮的主权,解除了联华轮的租约。日本驻重庆领事松岗寿八来重庆总商会,请温友松维持日货,温友松以“买卖自由,不能逼人买”为理由加以拒绝。在温友松带动下,重庆各商帮停止了向日商武林洋行付30万两的贷款。在“五四”运动时期,重庆日货逐渐被国货所代替,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年8月,温友松与汪云松等人创设中国留法

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温被推为副会长。

1921年7月,川军第二军军长刘湘率部进驻重庆,就任川军总司令。他为了在重庆站稳脚跟进而建成长久的基地,首先尽力拉拢地方各界人士。刘湘为取得经济上的支持,亲自出面与温友松交朋友,将中和银行采取军商合办方式(资本额为60万,军商各占股份为2与4之比),温友松任经理,前任总商会会长赵资生任协理。1922年7月7日,熊克武、但懋辛的第一军与刘湘的第二军开战,刘湘败退。熊克武、但懋辛进占重庆,以友好的态度与温友松交往,托请代第一军向重庆工商界筹办军饷。温友松又出面接待,安抚进入重庆的各军部队。

当时,温友松所办的缫丝业得到较大的发展,他又在柑子坝开办了华康丝厂。除办丝厂外,温友松又创办重庆永庆轮船公司,五年获利100万余元。后期温友松培养温少鹤接办他的企业和重庆总商会工作。1925年3月14日,温友松在重庆病逝。

## 陈开祉

陈开祉,字宛溪,号愚溪,1855年(清咸丰五年)出身于三台县万安场一代躬耕的农户之家。他幼年丧父,家境清贫,但却有志于学,16岁考中秀才,后

经族人举荐,在本乡及附近塾馆执教。

陈开祉目睹列强欺凌,国家主权丧失,民不聊生,故在课读之余,每每审时度势,认为惟有振兴实业方是救国之良

策。他在玉皇庙塾馆执教时,见庙内僧众栽桑养蚕获利甚厚,一季收入远非教书岁银可比,又闻广东海南侨商陈启源创办继昌隆丝厂生财致富,遂萌拓业蚕事之心。1877年他毅然辞馆,回归故里,从事栽桑养蚕和缫丝。

陈开沚按当时刊行的《三农说》、《蚕桑辑要》所载栽桑技术,于房前屋后及沟边地角,精心培育桑苗,并在家中仅有的1亩7分地上间植桑株,历三四年,桑树成林,蚕事亦随之兴旺。收茧之后,复又缫丝。经10余年惨淡经营,规模渐大,每年可收桑叶20余万斤,采茧百数十担,自制手摇车亦改为脚踏大车,继而又将所积40余万贯扩大投资,更新设备,并于万安寺工棚试用建体瓦缸炉缫车取丝成功。至此,一个缫丝手工业作坊初具规模,形成现代企业雏形。他又奔走四方,组织成立蚕桑会,推广蚕桑技术。

陈开沚主张博采新法以振兴旧业。海南继昌隆用蒸汽机缫丝,生产效率提高10余倍,产品质量亦远比手工缫丝为优,丝价高于大车丝,遂赢厚利。陈开沚亲赴省城农政学堂索取技术资料,并于1903年仿效日本在万安场凤凰山下动工兴建裨农丝厂,又在张家坝修筑涧沟800余米,引凯江之水缫丝洗丝,兼得灌溉之利。裨农丝厂以铁机丝车缫丝,开川省铁机制丝之先河,影响之大,遍及全川。裨农自创办以来。年年增产,盈利倍丰,为全川蚕丝业界所瞩目,故各地

丝商,竞相仿效,纷纷设立铁机丝厂,三台县丝织业从此亦日趋进步。

1910年,为拓展川省的蚕丝业。陈开沚指令裨农派员至犍为、阆中等地协助始办新厂。数年之间,各地大小丝厂如雨后春笋纷纷拔地而起,年产量合计达三四千担,川丝声名,是以大著。丝厂的锐进,导致叶源匮乏,为进一步拓展川省蚕业,陈开沚刊发《劝桑说》,传布蚕桑技术,号召乡人广植桑株,共亲蚕事。他在《劝桑说》中写道:“况当师旅频临,饥谨交迫,贼盗蹂躏,证税繁难,今吾蜀救贫之计,孰有如整顿旧有之蚕桑乎!”在他的号召下,当时川省各州县工商人士均闻风响应,大小业主纷至沓来。以致出现了“涪凯二江收淘桑子,醉毙河鱼,购取桑秧,载盈舟楫”之盛况。

1915年,陈开沚出任三台县蚕桑局长,旋在全县28个乡普遍推行栽桑养蚕,并亲赴江浙考察改良丝质的最新技术,延揽招聘蚕桑技术人员。是年,又在乐山兴办华新丝厂。陈氏办厂,务求实效,故于企业管理,十分严格,每日必进车间巡查,倘遇不合之处,立即召集职工,当场训诫,及时纠正,还将厂规厂纪及生产管理条例编成《丝厂俗歌》和《妇女缫丝歌》,让职工熟读熟背,自觉遵守。裨农丝注重质量,坚持优质生产,从原料、燃料到每一个工序,层层把关,一丝不苟,故裨农出品,声誉特著。当日本大地震时,每担丝卖价,最高达银1600余两,即1两银交换1两生丝,与银等价。

裨农试缫出口丝,是用清塘茧5至6颗,煮八分熟,做成三五丝(细丝)。缫丝用水,须过滤杂质,严格化验,升温至50摄氏度方能使用,违者经济制裁。全厂职工兢兢业业,不断改进,丝质品位日逐提高,不但在上海市场备受欢迎,而且可与日、意两国黄白丝质媲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裨农丝质因优于日本而首次进入美国市场,冲开了川丝外销之藩篱。20世纪20年代为裨农丝全盛时期。当时裨农缫制的金质双鹿牌三五丝,在外贸市场上,连挫日、意两国生丝,

并在国际公赛中两次获奖,为川丝争得荣誉。

陈开沚于办实业之外,复又呕心沥血,积数十年创办蚕丝事业之经验,撰写《劝桑说》、《蚕桑浅说》和《裨农最要》,广为刊布,为发展四川蚕业,作出了又一巨大贡献。以上著作,均已载入《中国蚕桑技术史略》,成为蚕桑史研究的宝贵资料,在中国蚕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26年仲秋,陈开沚积劳成疾,心血耗尽,歿于嘉州(今乐山)。

### 刘继陶 刘象曦(合传)

刘继陶,生于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巴县人。出身贫寒,少年时随父学道士,不堪其苦。16岁时,私自逃跑至重庆城内,在同乡刘老德开设的绸布店学生意。刘老德嫌其迟钝而贪睡,转介去全信裕当学徒。

全信裕是金秀峰(外号人称“金十万”)开设的商号。经营的业务,上货以匹头为大宗,兼办棉花、百货;下货贩运白蜡、桐油和成都蜀锦。刘继陶进了全信裕,再不贪睡,谨慎从事,博得金秀峰欢心。出师以后,当上了先生,随后又被派到外庄进货,他所经办的事,处处顺手。约在1860年,金秀峰派他去成都进收客户货款,时值银根吃紧,客户交不出

现金,将历年积存的滞销品、丝棉花边,即俗称的“阑干”作抵。刘装船东运,过嘉定(今乐山)遇险船翻。他把打捞起来的水渍货运回重庆,深受老板责备。无可奈何,只好将全部水渍阑干送到染坊染为青蓝二色,下运宜昌、汉口推销。阑干乃妇女服装和清军军服镶饰衣边所用,贵在色彩绚烂,青蓝二色怎受欢迎?事有凑巧,时值咸丰皇帝逝世,全国百姓都须缟素,不能穿红着绿,刘继陶适逢其时,所运阑干意外地得到畅销,转祸为福,获得几倍厚利。他在商场中,从此有了“福将”的名声,愈得老板的信任。1875年前后,金秀峰瘫痪,派刘为大掌柜,全权主持全信裕的业务。

1878年,金秀峰病死,其妻结束全信裕,分给刘继陶1万多两银子的酬劳金,并将没有收回的水脚尾子和客户所欠货物尾款,一并转赠与他。当时刘已颇著声誉,商场中人多愿与之合伙经营。于是刘继陶将分得的钱,加上凑集的股金共约5万两银子,组成德义生商号,承袭了全信裕的全部业务往来,并着重经营山货、药材。以他的声望,加之经营有方,不两年,德义生的资金就积累到白银14万两以上。之后,刘更加放手经营,不断扩大业务,深入滇黔产地大量收购山货、药材。他经营德义生近20年,一帆风顺,盈利越积越多。1898年,刘继陶利用余栋臣起义在川东爆发,重庆市场混乱,物价大跌的机会,大量收进下货;同时责成宜、汉外庄多进棉花、洋布等,陆续上运。后来,余栋臣起义被清政府镇压下去,重庆市场缺货,物价上涨一二倍,德义生经营的上下货,正好碰上档口,赚了20多万两,连同当时德义生的资金号称百万。刘继陶遂成为重庆最早的一个“百万富翁”。当时重庆著名商人,如匹纱帮的杨文光、杨佑廷,药材帮的杨星亭,都不及刘的实力雄厚。商场中遂流传着“三羊(杨)不如一牛(刘)”之说。

此后,刘继陶因精力不济,退居幕后,乃结束德义生,把这三个字拆开,先后成立了德厚荣、聚义生、同裕义三家字号。刘继陶的全部资财,除一部分投入房地田产外,大都由德厚荣继承下来,成

为刘氏后裔独资经营的企业,而以他的亲外侄蒋沛霖主持业务。聚义生和同裕义分别交由亲戚黎焕章和学徒李迎春等负责经营。后来这两家与刘家脱离了关系。

刘继陶腰缠百万,正好是官府勒索的对象。因此,他到了晚年,便延请名师在家设馆,严格督课儿孙辈习科举之业,并筑“传经”书室,藏书近万卷,还不惜花钱为儿子捐官,希图后人出商入仕,有钱有势,不受官府欺压。

刘继陶于1900年去世。企业由第四子刘象曦(名镇纬)出面经营。刘象曦曾中秀才,其父生前替他捐了个“兵部郎中”,在赴京候差补缺时,结识了一些军政官吏。但他是个书生,不懂经营管理,从1901年接管德厚荣之日起,即以他的表兄蒋沛霖担任总经理,总揽经营大权。其时,德厚荣经营的山货药材品种,比德义生更有增加,资金也更为集中,经常拥有五六十万两周转金,堪称重庆字号的第一家。随着出口业务的发展,德厚荣与洋商买办往来日密,业务重心也就逐渐转移到省外。

光绪末年,德厚荣遂将总号迁于汉口,业务更加扩大,兼营斗载,以四川的米、麦、杂粮运销湖北,在长沙收购大豆运销沿海。湖北人徐荣廷担任了长沙经理,他与黎元洪私交甚笃,辛亥革命后,黎任湖北都督,即荐徐出任湖北省官钱局总办,成了汉口金融界著名人物。1912年,刘象曦同徐荣廷、蒋沛霖等用

新组成的楚兴纺织公司名义承租了湖北省官办的纱、布、丝、麻4厂。楚兴公司的股本70万两，前承租人应昌公司43万两，德厚荣新股16万两（实缴11万两）。规定新股为优先股，年终分红“新股分三两，旧股分一两”。德厚荣占新股的近2/3，实力较厚，且有黎元洪为其政治后台，故得总揽公司大权。刘象曦被推为总经理，徐荣廷、蒋沛霖任协理，徐兼坐办，代表德厚荣全权主持公司业务。从1913年2月起，纱、布、麻3厂次第复工，丝厂停办。这时，纱厂拥有近4万锭子，布厂有电动织布机500台，新式纺纱机5万锭子；原料系就地采用湖北棉花。产品是14支和16支黄鹤楼牌棉纱，与各种天字官布商标粗细宽洋布。销区是两湖和四川。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洋货进口锐减，楚兴公司在湖北是独家经营企业，少有同业竞争，纱布产品畅销无阻，获利甚丰。德厚荣每年分得的纯利平均约为30万两，在10年租期内，总共分得赚项当近300万两。

在此期间，徐荣廷及其助手苏汰余积极扩张自己的经济势力，收买楚兴旧股。后来租期届满，楚兴解约，他们就在石家庄开办大兴纱厂，在汉口开办裕华纱厂，成为国内纺织业的有名人物。刘象曦和蒋沛霖则抱着德厚荣的招牌，经营他们当成看家宝的出口业务，使德厚荣进一步为洋商效劳。约在1915年，蒋沛霖利用德厚荣的实力，挤垮原来买办

欧阳惠昌，当上了英商安利英洋行的买办。1918年，德厚荣又当上汉口怡和洋行的出口买办。这时，德厚荣业务遍及数省，资金积累约达600万两，名噪一时。当时武汉有4个姓刘的大资本家，即“地皮大王”、东方汇理银行经理刘歆生，茶商、俄国银行经理刘子敬，武昌震寰纱厂经理刘季五，德厚荣老板刘象曦。商场中流传着：“湖北三个刘，比不上四川的一个刘”。

德厚荣为洋商效劳，终不免于吃洋亏，或遭踏价收购，或者不得不以高价买来上预货。向怡和洋行经营的出口业务，在1919年至1923年5年中，总计亏折20多万两。刘象曦、蒋沛霖以楚兴公司为有力支柱，有恃无恐，不断盲目投资，又陷进了泥潭。1917年先后在河南郾城、安徽蚌埠和天津创办3家机制蛋厂，短短3年共亏损120万两。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庆买办军火商罗升之鼓动刘象曦、蒋沛霖包销黄铜，以应军阀刘湘所控制重庆铜元局铸造铜元之需。还听罗的吹嘘，投资20万元，与绅商李培之等合伙在重庆组成康宁轮船公司，以罗升之做总经理。开业不久，罗即利用以50万元所收买的两艘轮船为其偷运枪支军火。1922年8月，罗升之因贩运军火案在重庆被川军第一军枪决，刘象曦接到电报，几乎昏倒在地。德厚荣马上派人清理罗的账目，种种损失达银币50余万元。

德厚荣因罗案牵累，亏损甚巨。当

时清理,对外债务已达150余万元。楚兴公司所承租的官办四厂,原订租期10年,到1922年,租期本未届满,而号称“湖北将军团”的唐克明、石星川等人,勾结湖北督军萧耀南组成楚安公司,对楚兴公司施加政治压力,硬撕毁了租约。刘象曦眼见大势已去,乃于是年宣布停

业破产偿债,历时2年,通过汉口总商会长周星堂等人的调解,以德厚荣在汉口所置价值100多万银币的房地产和刘氏弟兄手中所有的股票作抵,偿清了全部债务。刘象曦煊赫汉皋的历史到此结束。

### 汤子敬

汤子敬,单字培,号厚珍,1860年9月19日(清咸丰十年八月初五)生,江西临川县人。其父务农为生,家境贫寒。14岁随叔父赴云南谋生,路过重庆时,同乡谢亿堂见汤子敬勤快伶俐,便留他在自己开设的谢亿泰布店做学徒。数年间,由学徒到帮账、管账、办内事、跑街、步步高升,一帆风顺,在同业中渐具声望。谢亿堂非常赏识汤子敬的经营才干,在汤30岁时特将自己的女儿许配与他。

19世纪90年代,余栋臣反洋教起义威震川东,重庆一般商人都惊慌失措,不敢进货。但是汤子敬却认为“要得富,险中做”,大胆将“谢亿泰”在上海所进的货全部运来重庆。这时市面上布匹奇缺,又正值清政府练勇急需赶制大批军衣,一时间布匹供不应求,价格暴涨,“谢亿泰”奇货可居,赚了一大笔钱,汤子敬也因此在同业中被誉为“有胆有识”。

汤子敬在谢亿泰布店20余年,朝夕奔走市廛之中,耳濡目染,创业兴家的思想与日俱增,加上他袖笼里的私生意和东家的业务逐渐发生利害冲突,势难在店里长处下去,到1899年便离开了“谢亿泰”,分得银子8万两。在此之前,他已私下开办了两个企业,一个是创立于1894年前后的聚福厚商号,以做鸦片买卖为主要业务;另一个是1896年开设的同生福钱庄。离开谢亿泰后,汤子敬又先后开设了源远流长、正大昌、德大永、正大永等钱庄,聚福厚、德大昌、德大合、裕生厚、大昌祥等匹头、棉纱字号以及聚福长山货号、协太厚银朱丹粉作坊等10多个企业。到1909年,“汤十号”便在重庆名噪一时。

这时的汤子敬,坐镇同生福钱庄,全面指挥和策划整个企业的经营活动,而各联号又相互吹虚标榜,张大声势,故其经济实力发展很快。他曾利用当时日货

大量倾销重庆、价格较低的机会,暗中把日货商标换成国货或英货商标,牟取暴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牛羊皮滞销,产区价格陡跌,他通过由聚福长山货号改组成的聚福洋行,大量收购囤积,大战结束时,一次盈利即达40余万两。由于四方得利,处处赚钱,“汤百万”的称号遂名满全城。这段时间,汤子敬俨然就是钱的化身,红得发紫。同业中有的要仰仗他的大名,只消他口头允诺一声,无须拿出分文,便成了某企业的股东,年终照例分红。有的企业一时发生信用危机,只要能请他光临号上稍坐片刻,或者求他送一条幅挂在墙上,便可转危为安,渡过难关。因此,后来人们又直呼他为“汤财神”。

在以后10余年间,汤子敬以同生福和其他几家钱庄为基础,一面在社会上吸收存款,一面支持汤家各联号从事商业投机活动,经营范围更加扩大,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当时他的经济实力约占重庆资金流转总额的1/3;匹头、棉纱业务在市场上首屈一指,特别是“裕生厚”成了各联号的轴心。他的房产遍布市区,有些通连成片,于是又有“汤半城”之名。他所经营的大昌祥盐号,以及乘人之危兼并过来的同亿义盐号,都曾盛极一时,居于“重庆四大盐号”之列。

随着经营的兴旺和业务的日益扩展,汤子敬在重庆建立永美厚银号,又在沙市、汉口、上海等地设立分号。他利用银号把其个人的大部分活动资金和汤家

所有企业的盈利全部集中起来,使银号成为他的总账房和在经营上发号施令的基地,从而使汤家各类企业都能互相呼应,更为巩固。

1925年,汤子敬为躲避军阀的敲诈勒索,携带现银100多万两,只身前往武汉,在汉口开设数家钱庄,并在进出口业建立据点。结果投机彻底失败,损失现银180余万两,使汤子敬元气大伤,汉口、沙市一带沿途各钱庄,大部分先后缩小经营或停业。重庆的同生福钱庄也连带损失30多万两。号称重庆第二市场的裕生厚商号,于1932年因受德丰、丰泰两家联号所经营的烟土在汉口遭火灾的影响,损失20余万元,被迫停业。汤子敬经过这一连串打击,情绪消沉,勇气锐减,但仍不忘重振家业。回到重庆后,通过其子汤志修、汤壶峤交结刘湘、刘航琛、范绍增等人,冀图借助他们的势力东山再起。

1933年汤子敬同范绍增开设四川商业银行,由汤任总经理。1934年又以负担刘航琛出任二十一军财务处长的登台费40%为条件,与刘湘、刘航琛开设川康殖业银行,汤壶峤一度担任经理。随后,又把商业银行并入川康银行,但不久就被军阀官僚排斥出银行。

此后,由于经济实力已大不如前,汤子敬便到处搭干股,做空头,拖骗混赖,从而信誉大降,连他的“班底”都渐次对他怀有戒心,有的干脆另起炉灶,分道扬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因法币不

断贬值,经营连连失利,加以做申汇投机失败和受金融风潮的冲击,汤子敬至此遂成强弩之末,一蹶不振。曾为他奠基立业,特别受他珍视的同生福钱庄,到1939年也仅剩资金1.2万元,最后只得

改换牌号,卖与别人经营。其余企业或先后歇业,或招牌换记。1942年,所存商号仅二三家。1943年9月24日,汤子敬在重庆病逝。

### 余述怀

余述怀,号仁禄,威远县人,生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家境贫寒,少年丧父,为人放牛种地。渐长,不安于贫,到自流井正街山货铺当徒,因其精明能干,能说会算,为贡井小商崔汝华看中,招赘为婿。1903年,余述怀与岳父等人合股顶办长腰滩李姓协和盛山货酱园铺。营业对象大多为当地井户,生意兴旺,获利不少。但未及3年,因井灶生意萧条,协和盛受其影响,股东见无利可图,纷纷退股。协和盛遂由余述怀独揽,锐意经营。清末,川局混乱,兵匪林立,交通梗阻,余述怀则结纳叙府(今宜宾)保商队,购运山货,独能在市面上居奇。同时又暗通荣威招安匪首廖明光,吸收其上万两轻息生银,作为商业和高利贷资金,因而大赚其钱。

1910年,盐场生产不振,贡井盐商王和甫因久欠余述怀债款无力偿还,被迫将海流井作为抵佃。自此,余述怀走上经营盐业为主的道路。他首先将海流井原有牛推车改为机车推汲,使卤水成

本降低,利润激增。随即发展机车,租佃五龙、伟龙、夔龙井火圈共100余口。此间,由于业务发展过大,流动资金不足,颇觉被动。但余述怀工于心计,察知盐商胡绍章资金充裕,遂设法与其合伙安通张家山至峰子岩之间的输卤视管,使龙源、双流两井每天进出卤水达1000多担,获利甚丰。进而经营双海、星龙、永蒸、宝通、永江等井。其后又贱价购得贡井南华宫产业,兴办成海、威宗、达江等几口高产盐井。抗战期间,海盐产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盐务机关对盐商起复井灶采取贷款扶持,余述怀抢先申请起复一批井灶获得巨额贷款。首先开办大昌炭花盐灶100余口,起复成海、宝善、鼎新、大江等井,租佃东源、龙涌、生海等黑卤井。火灶随之增添,拥有火圈近400余口。1941年,贡井(即西场)商场联合办事处成立后,余述怀被推选为主任,在同业中渐具声望。

余述怀立足盐场后,凡有利可图,均全力以赴。在运销方面,除自营德昌盐



号外,还投资刘瀛洲中华、蜀通盐号;在其他工商业方面,开办大同煤矿,经营煤栈。又开办灰厂、木厂、糟房、酿造厂,使盐灶地所需作料不向外购买,利益毫不外溢。其后,又在江津、威远、富顺等县大置田产,每年收租谷 1300 余石。1943 年,余述怀借长子余厚钦在美国留学之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开办“天禄兴业贸易公司”,购回人参、手表、汽车在国内销售,牟取暴利。1944 年,又以 3 亿元法币接顶军阀唐式遵的“四川建设银行”。此间,余述怀所属各厂矿职工,已由抗战前夕的 200 余人,激增至 2200 余人,此系余述怀经营工商业之鼎盛时期。跻身贡井盐场四大少壮派(即余述怀,宋俊臣、黄学周、刘景贤)之林,位居贡井盐商之首。

余述怀经营盐业,有一整套管理企业的办法。首先建立“金字塔”式的管理机构。以其住宅“天禄堂”为办事总机构,设总柜房,自任总掌柜,其下设总管事、管事,启用亲朋挚友中有办事能力者充任,分层负责。其二,经营方式灵活多变。能联营则联营,能自营就自营,做到自产、自销、自运。达到利不外溢。其三,重视市场行情,囤积居奇。余述怀常派余伯钦,余泽江等人到威远、自流井等地探听行情,了解物价变化情况,人称

“满天飞管事”。又凭借资金雄厚,每年购储粮谷及燃料,均在其企业所需半年以上,不受物价波动影响。其四,大权独揽,事必躬亲。每日鸡鸣起床,查阅所属各企业循环簿之后,就坐四人大轿到各井灶巡视,发现问题,立即处理。数十年如一日,从未懈怠。

余述怀对于兴办地方文化教育事业颇为热心。先后与地方人士集资办贡井图书室、私立育才小学,1938 年,创办贡井第一所中学——私立旭川中学,立案资金大多由其暂垫。1943 年,余述怀 60 寿辰,特捐款 2000 多万元,修建旭川教学大楼一座。1946 年,捐款 400 万元修建四川大学工学院试验馆,命名“述怀馆”。

1944 年 6 月 15 日,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会长冯玉祥到自贡倡导献金,余述怀被公推为自贡市节约献金分会理事。他捐献法币 1000 万元,此举造成“全国个人献金新纪录”。其后,冯玉祥特精制“今之弦高,献金楷模”横匾,亲送余宅,并赋诗相赠。同年冬,蒋介石以余“慨献钜金,特电嘉奖”,并亲自予以召见。

1947 年 11 月 4 日,余述怀被入室盗窃的小偷击伤头部,因伤势过重,于 1948 年 1 月 5 日去世。

## 卢作孚

卢作孚,原名卢思,生于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合州(今合川县)人。出身卖麻布的小商贩家庭。因家贫,小学毕业后即告失学。1908年到成都入补习学校,继后坚持自学,并任家庭教师维持生计。21岁时编成《数学难题解》一书,由重庆铅印局出版。辛亥革命前在成都参加同盟会,积极投入反对清政府出卖路权的保路运动。1913年,胡景伊督川后搜捕革命党人,他逃至大足被逮,经友人保释脱险。1914年出游北京、上海,与黄炎培在上海相识,结下深厚友谊。旋回乡执教,参加编写《合川县志》。后又去成都,在《群报》、《川报》任记者、编辑、社长兼总编辑等职,撰文抨击时弊。其间,他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成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1921年,卢作孚应永宁道尹杨森之请,往泸州任道尹公署教育科长。他先后聘请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王德熙、恽代英到泸州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大力改革教育,广泛开展通俗教育运动。1924年,杨森任四川督军,邀卢作孚去成都创办民众通俗教育馆并任馆长,时仅1年,成效显著。后因杨森被省联军击败,卢作孚也随之离蓉。遭此挫折,他决意弃学从商,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1925年夏,他对川江航运进行了详

细调查,然后选定在嘉陵江上重庆至合川一段开办轮船运输,以适应各方需要。在教师、同学和一些地方人士的支持下,开始集资筹备。几经周折,终于在上海订造了1艘载重70吨、价值3.5万元的小客轮。1926年6月10日,卢作孚在重庆召开公司创立大会,企业定名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寓意为实现孙中山民生主义而奋斗),新船命名“民生”,他被推为公司总经理。由于营业兴旺,信誉大增。接着又相继订造新船,开辟了渝碚、渝宜、渝叙等线。

渝合线的中心是北碚,这一峡防地区分属军阀刘湘和邓锡侯两个防区,土匪乘隙盘踞,航道不靖。1927年两军协议,委卢作孚为峡防局长。他接任后亲自训练峡防队伍,以武力肃清土匪,保证了渝合线航运畅通。与此同时,他还对北碚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规划,从工矿、交通、科技、文教等方面进行了有计划的建设,均著成效;又设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等机构,使北碚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实验区,对后来四川的开发起了积极作用。

卢作孚生活十分简朴,从不置私产,工作不计时间,不知劳累。他把“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作为民生公司的宗旨,并以此为“民生精

神”。他以身作则,勤奋经营,并经常向职工宣传爱事业、爱国家的思想,团结公司上下,艰苦奋斗,共同为“民生”的发展而努力。

至1932年,卢作孚以“买并”(即一部分付现款,一部分转为股票)的方式,几乎接收了长江上游的所有商轮;其后又先后将川军将领刘湘、潘文华、范绍增、李家钰、杨森、刘文辉等经营的轮船,并入民生公司,使公司轮船增至19艘,职工千余人,成为川江上一支强有力的航运力量。

在此期间,卢作孚还大力整顿经营管理,在民生船上废除外轮“三包制”(“三包制”,即外轮一向把事务、轮机、驾驶三部门分别包给中国买办办理。客运方面,除大餐间外,官舱、房舱、统舱等则包给大买办,由大买办再邀集二买办、三买办、管事、厨工、茶房等承办,共负盈亏。中国商轮当时也一直沿用这一办法,层层营私,流弊极大)的陈规,实行有自己特点的“四统制”(“四统制”,即全船人员由公司统一任用,船上驾驶事宜由船长统一指挥,船上业务、事业由公司派经理统一掌握,船上燃料、材料由公司统一核发。“四统制”的实行,使航业经营出现崭新气象,被航业界誉为民生公司富有成效的改革之一)。精心培训水手、茶房、理货人员等,对货物负责保管,对旅客和蔼可亲,废除索取“小费”,伙食办得经济可口,船上播送音乐,介绍沿途风光,供应书报文娱用品,开联欢会。全船

职工一齐动手,代旅客提行李,发邮电,送饭菜汤药,缝补破裂包裹,卢作孚经常参加服务。旅客们对民生公司交口称赞,四处传扬,宁肯多住几天旅馆,也要等着坐民生公司的船。

重庆自开埠以后,川江航运即被英国太古、怡和,日本日清,美国捷江等几家外国轮船公司所把持。中国人同海关打交道,要用洋文,说洋话,连轮船上使用的提货单、航程簿,都要用洋文。卢作孚对此极为不满,慨叹“这真是成了外国人的天下”。1929年,刘湘任命卢作孚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他取得刘湘的支持,决定限制外轮在川江的活动,以维护航权,毅然宣布:凡外轮进口必须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申报),接受中国士兵上船检查;外轮也要承担兵差损失费,遇到木船要减速行驶,如浪翻木船必须赔偿一切损失。又发动码头工人对拒不结关的外轮,不予卸货。经过斗争,骄横跋扈的外轮,终于接受了规定的条件,从而为维护川江航权迈出了胜利的一步。

外轮船主发现他们遭遇了一个民族意识很强的劲敌,立即联合一致,相率大幅度降低客货运价,并向货主旅客赠送物品,争揽业务,企图以此来压垮民生公司。卢作孚面对强敌,毫不示弱,时值“九一八”事变之后,民众反帝爱国情绪至为高涨,他参与组织“重庆抗日后援分会”,并召开“收回内河航权大会”,发出“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中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号召,在民生船上实行“甲级船不

任用外国人,均由中国人担任”的新规定。任命周海清为甲级船上第一个中国船长,并把提货单、航程簿一律改为中文。各界人士对民生公司的爱国行动,热情支持,自觉不坐外国船,不将货物交外轮载运。

这场与外轮的激斗,历时数年,外轮竞争失败,民生公司壮大发展。1934年,意商“光华”轮拍卖与民生公司。1935年,美国捷江公司倒闭,它的5艘船也被民生公司收买,卢作孚夺回川江航权的理想初步实现。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卢作孚动员全公司力量,积极投入抢运抗战物资的战斗。他亲临现场,与童少生(副总经理)等一道带领职工,冒着日机轰炸,采取“三段航行”,开办“川江夜航”等措施,终将20万川中健儿送上抗日前线,把数十万吨军工器材及迁川工厂设备运入后方。由于有功抗战,卢作孚获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1935年至1937年,卢作孚还兼任了四川省政府建设厅长,对促进四川水利建设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多所致力。1938年初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1940年夏兼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几年中他深感国民党内派系复杂,政争尖锐,窒碍重重,难有作为,坚请辞职。1941年和1943年,分别辞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及交通部次长职务,全力投入对民生公司的经营管理。

抗战期中,民生的船只最多时达

116艘,较抗战前猛增一倍多。卢作孚决心大力发展海洋航运事业,准备开辟南洋、北洋两条线,为此,他决定借外资造船。1944年,卢作孚作为中国实业界代表之一,出席在纽约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和建议,受到会议的重视和通过。会后他前往加拿大洽商借款,达成由加拿大3家银行借给民生公司1275万加元的借款协议。卢作孚此款向加拿大两家造船厂订造了新型轮船9艘。迄1949年,历经种种周折,新轮终于陆续建成,先后驶回,航行于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尼、缅甸、新加坡、印度和日本,成为远东航业界一支崭露头角的新军。

从1925年到1949年的24年中,民生公司经过卢作孚艰苦创业,惨淡经营,成为拥有150多艘江海轮船和8900多职工的庞大企业,不仅统一了川江航运,取得了长江中下游航运业的优势地位,而且把航线由内河伸向远洋,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家民营航业公司。

全国解放前夕,卢作孚通过各种渠道,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1950年6月,他在周恩来的关怀、香港中共党组织的缜密安排下,从香港回到北京,并先后将被劫持到台湾和留在香港的轮船近20艘(约值5000多万美元)驶回广州,完成了保产任务。

卢作孚抵京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0月,返回重庆,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

员会委员,并继续担任民生公司总经理。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重庆不幸逝世。

卢作孚先后发表的论著有《乡村建设》、《东北游记》、《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工商管理》、《论中国战后建设》等。

## 黄墨涵

黄墨涵,原名黄云鹏,1883年(清光绪八年)9月出生于永川县永昌镇。1902年考入成都东文学堂。在校期间曾与同学龙国桢、董修武、王佑瑜等人秘密组织反清小团体。1904年毕业后,官费资送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习普通科,并从章太炎学习国学。

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黄墨涵愤而回到上海,参与筹办“中国公学”。不到1年,复去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3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曾翻译了瓦古娜著《财政学》一书。

1910年夏天,黄墨涵归国。参加学部举行的留学生考试,被授予法科进士。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章太炎归国,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黄墨涵赴上海见章,被嘱起草章程。1912年1月4日,联合会机关报《大共和日报》创刊,章太炎任社长,黄墨涵任主笔。后中华民国联合会改为统一党,与国民协进会、民社党、国民公会等合并为共和党,选黎元洪为理事长,黄墨涵为总务主任。7月,黄墨涵出席四川省临时参议

会,被选为审查长。会毕,四川军政府委任黄为浚川源银行重庆分行经理;财政部又委任他为重庆大清银行清理员。8月被选为共和党四川支部常务干事。同时,他还参与筹建共和党重庆支部。

1913年3月,黄墨涵被推为众议院议员,他和王湘等40余人,于6月成立新共和党。7月复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理事,在天坛起草宪法。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国会,黄墨涵去中国公学大学部任校长,兼教《比较宪法》。

1914年12月,四川巡按使公署任黄墨涵为浚川源银行总行经理,黄将该行改为官商合办,业务得以恢复。1915年袁世凯派陈宦入川主持川政,电财政部撤销浚川源银行官商合办案,退还商股,仍为官办。黄墨涵因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曾被陈宦逮捕。1916年6月,袁世凯死,8月,国会恢复,黄墨涵去北京继议宪法,主办《多闻日报》,评论时政。1917年7月,赴天津参加反张勋复辟的活动。不久,被推选为第二届国会参议员,并任大理院特约律师,后又加入段祺瑞、徐树铮组织的安福俱乐部。直皖战后,参与

反对曹锟贿选大总统。1924年,受段祺瑞把持的执政府之派,黄墨涵回川调解四川军阀之间的混战。次年被任命为四川省财政厅厅长,与诸同事搜集资料编成《四川财政录》,公开了多年财政上的秘密。该书出版后不久,他辞职回永川,被县人推任马路局局长,兴修永川境内公路。又捐赠兴办图书馆,发起募捐,成立永济会。1929年刘文辉聘黄墨涵为四川省政府顾问,并任考核委员兼训练员,后又兼任志成高商校校长。1931年被选为四川代表,赴南京参加修正《约法》会议,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同年7月,任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襄试委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在北京组织抗日协会。

1932年,黄墨涵被聚兴诚银行聘为上海分行经理,从此转入商界作资方代理人,两年后,调任成都分行经理。1935年刘湘任黄墨涵为四川省府法制室主任。“七七”事变发生后,黄墨涵在省务会议上主张组织民众,加强抗日力量。四川民众干部训练班开办,黄任教育长。1940年,黄墨涵升任聚兴诚银行总行协理,曾一度代总经理。1944年又创设华威银行,任董事长及重庆行经理,并在永川设立分行。

1945年,黄炎培约黄墨涵参加“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为主席团成员。不久,又参与筹建“中国民主建国会”,被选为常务理事兼财务组主任,并参加重庆分会的筹建工作,在银行界征

求会员。1946年2月初黄墨涵参加“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工作,并应施复亮之约,准备在大会上发表演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制造了“较场口事件”。后黄墨涵作诗《较场口庆祝政协成功被暴徒破坏》,愤怒斥责国民党特务的暴行。

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吴玉章,走访各界人士进行联络,曾专门邀请黄墨涵(他们是留日老同学)。通过与吴玉章交往晤谈,黄墨涵找到了真正“救世”真理,加深了对革命的认识,更加积极地参加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

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在重庆发动了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六一”大逮捕。黄墨涵亦被列上黑名单,只因年老未捕,改为监视。7月,民盟、民建等民主党派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明令取缔,被迫转入地下活动。黄墨涵在民生公司、华康银行、周均时家与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保持联系。

临近解放,国民党更加疯狂逮捕和暗杀民主人士。胡子昂被通缉,其子胡克林亦被追捕。黄墨涵与胡克林决定暂避成都,一边暗中对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进行策反工作,一边筹建民建成都分会。他与裕华纱厂经理黄鱼门、申新纱厂经理章则汶等接触,宣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政策,消除他们的顾虑,鼓励他们“反抽资、反歇业和反停产”。成都解放前夕,黄墨涵与马寿龄密切联系,并商定往彭县参加刘文辉、邓锡侯两

军起义。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黄墨涵组织棉纱、面粉行业的职工乘卡车走在前头迎接解放大军进城。后曾两次被邀参加人民政府会议,受托对地下民建成都分会的成员进行审查,并受民建总会指定为第一召集人,与王廷弼、黄宪章、王彦立、陈祖湘、马寿龄等正式成立民建成都分会筹备委员会。

建国后,黄墨涵曾任相辉学院院长,聚兴诚银行常务董事、“川北土改参观团”副团长。他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先后被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及重庆市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常委、四川省工作委员会常委、重庆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5年11月8日,黄墨涵在重庆病逝。

## 奚致和

奚致和,字箴,生于1885年11月2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潼南县人,其父出仕南充,在县城大北街置有房产,因之举家迁居南充县。

奚致和青年时代富有爱国思想,致力于“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他与张澜交谊甚厚,深受张澜器重。1906年,奚致和于南充速成师范学堂毕业后即进入商界。1911年追随张澜、罗纶等投身四川保路运动,后曾任川北宣慰使幕府财政科长。

1913年,奚致和与张澜等支持私人集资在川北重点养蚕区南充县南门坝创办“果山蚕业社”,同时大力赞助“南充都京坝丝厂”(现南充丝二厂),颇见成效,振兴和发展了南充蚕丝业。

1920年,张澜倡议川北自治,成立南充地方自治筹备处,开办地方自治讲

习所。奚致和积极支持,并在经济上给予大力资助。次年奚致和任南充县商会会长,致力于南充县的商业发展和地方建设。在张澜的倡导下,改造南充旧城,他在商界筹集资金,协助当局将县城外一条破烂不堪的小街,改造成为坦荡如砥的大街,即今“模范街”。后又修建了果一街和果一商场。1925年奚致和与张澜等集资创办了“嘉陵铁机织绸厂”,他任董事长,并开办“利国丝绸印染厂”。翌年,刘湘驻防重庆,经张澜举荐,奚致和被聘为四川善后督办公署财政处长兼二十一军军需处长,掌管军需、财粮,他为刘湘开拓财源,节约开支,成效显著,后因对刘湘扩展势力、争夺地盘大为不满而辞职。

1936年奚致和与张澜、鲜英等在南充建立四川蚕丝改良场,负责全省蚕丝

改进工作,并建成一座科学养蚕房——原蚕室,由张澜亲书门额。奚致和还出任南充丝绸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南充丝业公司董事,后又任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1943年,南充西南合作丝号成立,众推奚致和为本号董事长。他与谭谦等人,联合集资组建“利国印染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先进工艺,在丝绸炼染技术上有新的突破,对四川丝绸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

奚致和对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极为热心,他协助张澜在南充创办南充民众教育馆,实行扫盲、普及教育,邀请梁漱溟等来南充主持办馆工作。1938年,张澜等人创办建华中学,由张澜任校长,聘奚致和任副董事长,他与鲜英募捐30万元支持办学,该校成为中共川北地下党的重要据点。奚致和还对南充育才高级职业学校捐赠了一幢两层楼的教学大楼,名“致和楼”,任该校及成达中学董事长,又对民德中学等捐赠甚多。1940年日机两次空袭南充,奚致和出资免费供应避难群众茶水和食物,掩埋死难同胞和救济死者家属。为便于防空疏散,于1941年倡议并捐资占八成修建县境明家河渡口便民石桥。奚致和还资助过南充救济院孤儿所及灾年施粥、施棺木

等。1944年,南充修建青居水电站时,奚致和担任筹委会主任委员,对电站工程的建设,起了推动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奚致和曾出任南充财务委员长、粮食部川北区粮食储运处处长。1941年加入张澜、黄炎培等创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称中国民主同盟),负责筹集活动经费。抗战胜利后,奚致和响应张澜等民盟领导人的号召,积极参与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并负责筹集民盟的活动经费。他经常奔走各方联络,还将其在潼南的田产变卖,资助民盟开展活动。他在南充期间,还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员袁观,营救过张澜的秘书沈伯常和建华中学进步教师黄天明等。由于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敌视和迫害,乃于1946年春迁居成都。同年夏,他在成都被捕,后经张澜等多方营救出狱。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奚致和出狱后仍继续坚持为民盟工作。

建国后,奚致和历任川北行署委员、财经委员、政协委员、工商厅厅长兼川北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1952年四川合省后,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兼财经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1955年1月9日病逝于成都。



## 杨文光 杨燊三(合传)

杨文光,名焕斗,1854年(清咸丰四年)生于江北县宝盖厢(今属重庆市江北区),祖籍江西南城县。自幼随父读书,1870年到合资经营苏广杂货、匹头、棉纱生意的聚兴祥商号当学徒,拜该号富商刘质堂为师。由于他处事周详,又有一定文化素养,渐为刘赏识器重。3年师满后,留任帮先生,不久即提升为掌柜。1886年商号改组,被吸收为股东。经过多年经商活动,他在重庆商界中已获“稳重、谨慎”名声。

聚兴祥商号结束后,杨文光与黄慧轩、刘荃臣等合资另组聚兴仁商号,资本为白银1万两,以经营匹头、棉纱、苏广杂货为主,并兼营五金、洋杂货以及药材、山货等土特产的贩运业务,由杨文光统管经营大权。后来股东先后下股,聚兴仁遂成为他独资经营的商号。此后,杨文光在经营中采取深购远销,长途贩运的方针。随业务的渐次发展,兼做存、放、汇兑生意,并先后在省内潼川(今三台)、绵阳,省外宜昌、上海等地设立分号。他把“做银子、做汇水、盘利息”视为致富秘诀,与在重庆的山西帮、云南帮、陕西帮等多家票号都建立了往来关系,利用票帮放款的充裕资金,大做生意,创设商号不下10处,获利颇丰。此时,杨文光已成为重庆商界举足轻重的头面人

物之一。

1898年,四川大足再次爆发余栋臣起义,重庆市场一片混乱,物价低落。杨文光审时度势,采取“人弃我取”的办法,利用票号的巨额现款,压价购进大批山货,药材等出口货物囤积起来,又在上海不断进货,分存于汉口、宜昌、万县等埠。余栋臣起义失败后,重庆市场交易渐趋活跃,这时,主要进出口商品已大部为杨文光控制足以左右市场价格;上海方面也因川货欠缺,价格上涨。杨文光看准时机,将囤积的进出口货物,分别投放重庆、上海等地市场,待价而沽。仅这一年,聚兴仁商号即获净利60万两白银。杨文光由此被人称为“杨百万”,成了重庆商场中的金字招牌。

杨燊三,名培英,生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为杨文光第三子。幼读私塾,稍长,进聚兴仁商号当学徒。1904年,杨文光拨银10万两,另组聚兴成商号,交长子杨寿宇经营,杨燊三被派往上海坐庄。到1907年,杨文光乃结束聚兴仁商号,退居幕后全力指挥经营聚兴成商号。次年,又让次子杨希仲和侄儿杨芷芬去日本留学,杨希仲后又转赴美国深造。

1908年,杨寿宇病故,杨希仲又远在日本,于是杨文光召回杨燊三,接任聚

兴成商号掌柜,改牌名为聚兴诚,同时扩大经营品种,增生丝、楚盐两大类。杨燊三秉承其父的经营方针,业务不断发展,几年中就在上海、汉口、宜昌、沙市、万县、自流井、潼川等地设立了分号。至此,杨氏家族财团开始形成。

1911年5月,保路运动在全川迅猛开展,杨文光、杨燊三父子,倾其杨氏家族全部财力乘机杀价囤购货物。半年后,重庆革命党人起义成功,成立蜀军政府,市场复苏,物价回升,聚兴诚商号及杨家所有联号均获巨额利润,净赚白银数十万两,为杨氏家族财团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时,蜀军政府号召捐助军饷及救济饥民,杨燊三在渝、万两地慨然捐银1.6万多两,以表对革命政权的赞助。

辛亥革命后,“聚兴诚”的资本更为雄厚,进一步开展了存放汇兑业务。1913年通过杨希仲打通关节,先后揽办了重庆铜元局购销业务,取得了代收川北盐税的特权,每年承汇总额逾900万两,收益远远超过商业利润,从而引起杨氏父子变商业资本为金融资本的浓厚兴趣。加之当时重庆商业日益发达,每年与各地互通汇款即达1000万两以上,急需一家民营银行来承办此项业务。于是杨文光、杨燊三均积极赞成杨希仲提出以日本三井财团为模式开设银行的倡议。1915年3月16日,由杨氏家族财团集资创办的四川最早的一家民营银行—聚兴诚银行在重庆正式开业。由杨文光

任银行事务委员会主席(相当于董事长),杨希仲任总经理,负责对外活动,杨燊三任协理,掌握银行实权。杨文光还于1914年开办了杨氏依仁学校,并设立商业班,专为聚兴诚银行培训经营管理人才,又出资白银1万两,在江北县建造贫儿院一所。1919年9月23日,杨文光去世。

聚兴诚银行创业初期,杨氏兄弟颇能通力合作。杨燊三采取“翻码头”的经营方式办理汇兑业务,常取胜同业。1919年他在四川最早开办储蓄业务,不惜巨资大力宣传,把许多人手中的私房钱都吸进了聚行。头三届(1915~1920年,每两年为一届)连获厚利,共赚130多万元。此时,杨希仲又设立了聚兴诚外国贸易部、航业部,以及十几家洋行的经销处,业务蒸蒸日上。

正当此时,杨氏家族出现了三、四房之争,演成分裂退股;接着三房内部杨希仲和杨燊三在经营管理上又发生激烈矛盾,致使聚行连年亏折,元气大伤。杨希仲深受刺激,于1924年在汉口郁愤自杀。杨燊三接任总经理,他精心整顿,紧缩外贸、航业等机构,任用人才,充实基层,并竭力扩大存放、储蓄、汇兑等业务,多方开拓利源,数年之后逐渐填补亏损,使聚行摆脱困境,重趋稳定。

聚兴诚银行开业以来,即成为当时军阀派款的主要对象之一,先后被派垫之款,累计达150万元,严重影响了聚行的资金营运。杨燊三为躲避军阀派垫之

灾,1921年将聚行总行及全家迁往汉口,但川中军阀派款如故。1927年刘湘派聚行及杨家公债9万多元,杨燊三发动全行职工并亲自出面与刘湘对抗,要求“旧债未清,新债免派”。这场抗垫保行斗争,僵持了5月余,终以杨燊三认缴公债1.5万元结束,从此杨燊三有了“犟牛”之称。

为了恢复聚行元气,杨燊三决定常驻上海,相机经营公债,弥补前损。1930年,蒋、冯、阎大战开始后,他认定蒋军必败,蒋所发各种债券必然下跌,便在公债市场上大做空头,初期蒋军失利,债券大跌。不意其后张学良通电拥蒋,带兵入关,夹击冯、阎;江浙财团乘机出手做多头,支持蒋政权稳定债信,债券迅速上涨。杨燊三察觉估计失误,欲图收手,但为时已晚,这场公债赌博使他赔去130多万元。从此,他深感江浙财团实力强大,聚行资力有限,难于匹敌,乃决心将经营重点转向西南,提出“把聚行建成西南第一金融机构”的新方针。1930年,他将总行迁返重庆,并陆续在川省各地及云、贵、桂等省重要城市设立业务机构,不数年,便在西南扎下根基。及至抗战爆发,各地资金拥入后方,一些中小川帮银行被挤垮;但聚行早已植根西南,根基深固,外来行庄实难与之竞争,业务一直不衰。杨燊三“植根西南”的方针,被金融界誉为“明智的决策”。

杨燊三经营聚行30余年,资本额最初为100万元,1937年增为200万元,

1940年又增为400万元,1942年再增为1000万元。历年来赚取了巨额利润,积累了大量财富,以1943年计算(以各年结出的纯益额累计),全行资产总值已达4.49亿。为聚行当时资本额1000万元的45倍,国内机构发展到30多个,员工1300余人,被国民政府指定为办理外汇银行之一,成为首屈一指的川帮银行,蜚声于国内外金融界,为旧中国商业银行史上成功的一例。

杨燊三早年即以“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八字作为聚行宗旨,他常说:“聚行并非杨氏一家一族的私产,而是一个社会经济事业团体”,勉励行员“以行为家,以行为终生事业”。他善于通过银行业务集聚社会游资,用以调剂工农商业的资金。他手订的经营方针是“扶助工农商业之发展”。1933年至1946年,他先后投资于有利国计民生的工矿、公用、交通等企业及各种商业共30多个,迄1943年投资总额达1200万元(其中投资于商业方面占总投资额的93.3%),超过资本总额,对扶助民族工商业起了一定作用。他的经营作风素称稳健,“不放高利贷”,坚持“薄利主义”,“细水长流”。放款方针尤为把稳,自己总结为“天晴借雨伞,落雨赶快收”的十字诀。他还善于培训人才,开业后的10年中,他亲手培训了学徒300多人,不但成了聚行的业务骨干,并为各家银行乐于延用,人们曾以“无聚不成行”之说,赞扬他对培训人才所作的贡献。

早在30年代,杨燊三即被称为川帮银行的代表人,1932年在刘湘支持下,被推为重庆证券交易所首届理事长,后又任刘湘军部财政设计委员会委员。他还担任过四川省银行理事,重庆市银钱业联合公库及银行公会常委等职。

杨燊三经营聚行的成就,曾引起官僚资本势力的觊觎。刘航琛凭借担任四川省财政厅长的权力,制造“查账”事件,逼使杨燊三于1937年将聚行由股份两合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刘航琛

乘机投入股本,进入聚行董事会,与杨燊三在聚行内长期争斗。1946年,刘航琛与徐堪等合谋,利用聚行资方、劳方及杨的九弟杨季谦等均对杨燊三的不满,逼使杨燊三辞去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改任高等顾问。

建国后,聚行于1951年实行公私合营,杨燊三被安排为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副董事长,并担任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政协常委、重庆市工商联常委。1962年病逝于重庆。

## 曾俊臣

曾俊臣,族名臣勋,字俊臣,号正然。生于1888年9月6日(清光绪十四年八月初一),威远县人。出身于破落商人家庭。9岁入自流井盐场当学徒,逐渐精通井、枧、灶等项业务,因其能说会算,20岁即由老板派驻泸州作庄客,为井灶采购粮食,已能独当一面。

1912年,曾俊臣辞去庄客,在泸州城自营“荣记”粮店。在癸丑之战中,泸州城经常被围,粮价暴涨,粮店生意兴隆,不期年即集资万两有余。1914年,曾俊臣独资开设“大餐楼”餐馆,时称泸州之最,也为驻军、商会、地方文人聚会之所。1920年,曾俊臣与胡绍章合资开办“复兴荣”盐号,设分号于重庆,转而从事盐业运输。1922年,曾俊臣受税西恒

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与温筱泉、梁云程、谌焕云等人集资兴建泸县济和水力发电厂,由其出任首席董事,税西恒、骆敬瞻负责施工建造。经近3年努力,正式发电,成为四川第一座水力发电厂。

1924年,曾俊臣将复兴荣总号迁至重庆,锐意经营,因其颇善交际,精明过人,翌年被同业推举为重庆盐帮公所会长。其时,刘湘占据重庆,盐税为其筹集军饷的一项庞大收入,商人要在此立足,也需利用军阀势力以保持其经销特权,故彼此互相利用,各有所图。曾俊臣为笼络地方权贵,常与四川盐运使陈国栋以及主管地方财政、税收、军需的甘绩镛、唐华、刘航琛诸人交往频繁。并暗中以重金贿赂或拉其入股;刘湘所需军饷,

曾俊臣竭力为其筹垫,从而深获各方信任。到1928年,曾俊臣经营楚岸(指由渝运销湖北)盐额,先后已达300余载(一载为9.36万斤),成为“旧中国最大的盐业运输商”。

1930年,王缙绪兼任四川盐运使,敲诈重庆盐帮期票10余万元,反诬盐商行贿。曾俊臣代表重庆盐帮向刘湘如实禀明实情,因而开罪于王。不久,王故意卡住重庆盐帮300余载食盐无法运销川外。半年之间,仅复兴荣竟亏损达30余万元,导致其破产。次年,曾俊臣出任潘昌猷的复楚盐号宜昌、沙市分号经理。继后又在重庆开办富丰盐号,经营小量楚岸盐额。此间为曾俊臣经商生涯中最为萧条的时期。

1935年,四川省政府为增加财源,采取公开承召鸦片烟商,给予经营特权。曾俊臣亟欲东山再起,认准“鸦片生意一本万利,大有搞头”,乃约万县大烟商石竹轩,李春江(不久出任四川禁烟督办公署署长)合资30万元,开办“鑫记”土行(取“三金合一”之意)。石任董事长,曾任总经理,以李春江、甘绩镛为后台,专营鸦片外销。在川滇黔各产区设店收购,集中于重庆加工,再运至汉口、宜昌、沙市一带销售。次年,烟土新货上市,市面价低,曾俊臣通过其后台李春江掌握重要商业数据后,认定“产不足销,一定看涨”,遂大量买进囤存;同时又以重金贿赂二十一军财政处长唐华,得知烟土即将增税,故又采取抢先预缴完税款,因

而逃得税利达三四十万元。同年底烟价暴涨,曾俊臣乘机将大量购存烟土抛售,获得“连续半月有余的每天十万元之巨和空前暴利”。因此鑫记依靠资金雄厚,官商勾结,从1年几百担、千余担做到几千担,最多时达一两万担,账面总金额达二三千万元。鑫记经营两年多,获暴利达200万元,曾俊臣由是被推举为重庆特业(指烟土行业)公会会长。

1937年,省府实行鸦片“统收统销”,由官方垄断经营,鑫记随之停业。不久因官营招致各方反对,遂又改为私营。次年,曾俊臣与川西财阀周云章、江津大烟商王政平等10余家土行合组为“庆康”土行,扩大经营范围。为笼络权贵寻求靠山,曾俊臣特意从自流井聘来名厨,每日备办珍馐异馔,伴以娼优,供其享乐。当时四川禁烟署长张静愚以及国民党军政大员贺国光(后出任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徐源泉、夏斗寅等常为庆康座上客。故曾俊臣经营特业,可谓得心应手,先后在省内外发展了40余处分庄,当时“四川烟商,以庆康为大,所囤之烟,以庆康最多”,几乎垄断了西南烟土行业,获利甚巨。到1939年,最大烟土外销市场汉口沦陷,国民政府下令烟土冻结,不准承运,加之股东间意见分歧,庆康至此收手。曾俊臣前后经营鸦片四五年,共获暴利达五六百万元之巨,时人称其为“鸦片大王”。

1938年春,重庆市面香烟奇缺,价格颇高,曾俊臣遂与邓起人、李懋卿等集

资10万元、开办蜀益烟草公司,生产主力舰牌、金钱牌香烟,月产200余箱,因其价廉物美,曾畅销一时。不久,外省大烟厂相继迁渝,加之英美洋烟充斥市场,竞争激烈,致使蜀益连年亏损,经营逐年萎缩。在经营烟草工业同时,曾俊臣还投机债券、金融市场,先后购买国民政府发行的“美金公债”、“美金储蓄券”60万元,黄金储券数千两,待债券行情上涨时,及时抛出,获得暴利。抗战胜利后,

曾俊臣又以500万元顶进重庆胜利银行,自任总经理,此间又先后购置大量田产和房地产业,自以为“从此可以稳坐钓鱼台,一生享用不尽”。但皆因时局动荡,物价飞涨,货币贬值。1948年后,曾俊臣所经营的蜀益烟草公司、重庆胜利银行等相继倒闭破产。

1950年后,曾俊臣被吸收加入重庆市工商联。1964年,病逝于重庆。

## 吴晋航

吴晋航,又名国琛,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生于仁寿县,祖籍浙江。1909年考入四川警务学堂。辛亥革命后,由巡官、署员、科员而科长,1916年升任重庆警察厅厅长,次年卸职。其后,在陈洪范、刘湘、刘文辉部充当代表,还任过丰都、梓潼、江安等县县长。在刘文辉部时间较长、关系尤深。北伐战争开始后,刘文辉派吴晋航与张笃伦一道任二十四军驻汉口代表。1929年间,同冷融一道任二十四军及四川省政府驻南京代表,与戴季陶、张群等交往,又挂上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头衔,为刘文辉联络各方,往来于京沪间。

1932年,刘湘、刘文辉争霸四川,发生激战。开战前,吴晋航曾为二刘合作奔走联络,在混战过程中,吴晋航仍迭电

刘文辉劝其停战议和,并出面斡旋。“二刘之战”后,吴晋航深感无涉足政治的资本,决意弃政从商。但他仍建议刘文辉与刘湘修好,争取刘湘支持,于西康建省。

吴晋航从商,最后选定金融业。1934年初,二十一军财务处长刘航琛邀他任川康银行总务主任,旋升襄理、经理。后因不满刘航琛屡次开墨条恣意提款,离开川康银行。与此同时,吴晋航与宁芷邨共同发起筹组和成钱庄,集资13.5万元,于1934年5月开业。因股东多系军政人员,外界不免猜疑,起初业务清淡。然而吴晋航接近地方上层,消息灵通,不久,即从吸收机关存款、做申汇、向地方银行领钞等方面推进业务,当年就获利10多万元。

1937年,和成钱庄增资为60多万元,改组为银行,吴晋航任总经理。抗日战争开始后,和成在西南各重镇遍设分支行处,以汇兑为重心,大力发展业务;同时还开办屯溪汇款,便利后方人员寄钱去沦陷区以赡养家口;又附设和益公司,从沦陷区购进纱布等物资运销西南,获得厚利。不到10年,和成银行已跻身于川帮银行前列,被视为“后起之秀”。此间,吴晋航还先后任四川生丝公司、华通公司总经理,四川畜产公司、四川桐油贸易公司、民生轮船公司、《新民报》等企事业的董事长、董事,四川省贸易局副局长,重庆银行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重庆银钱业放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成为重庆金融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抗战胜利后,和成银行经营的重点移往上海,并于广州、南京、汉口、宜昌、香港等处设立分行,分支行处几乎遍布中国南部通商要地。1948年,吴晋航赴美国考察银行业务。其时,和益公司已改组为和彝公司,在香港、纽约等地设立了机构。吴晋航到纽约,便以和彝名义,与美国英科公司签订代售桐油契约,把业务伸向海外。

吴晋航经营和成银行,以稳健著称。他注意市场动态,留心时局变化,力避大的风险;在通货贬值之际,力求保本保值。同时,通过投资,交好四川畜产公司、民生轮船公司等大型企业;还把积累的100万美金,部分存贮于上海商业银行,显示财力、增益资信,在头寸周转上

取得有力支持。

吴晋航比较开明,善用青年。全行职工700余人,招来的青年即占80%。经过培训和业务实践,不少人担任总分支行处经理、副经理、襄理、主任等职,人称和成为“青年银行”。青年职员中的中共地下党员遭遇危难的,他出于对青年的爱护,辄加以营救和掩护。

在抗日战争进程中,民主浪潮兴起,逐渐影响到吴晋航。1942年,周恩来初会刘文辉,地点即选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的住宅。抗战胜利后,和成设立汉口分行,吴委中共党员赵忍安为经理,对赵的社交活动有所支持。他还以经费资助民主活动,民盟总部迁往上海,张澜由川去沪,吴晋航送去黄金20两相助,并接纳张澜在上海和成银行小院居住。其后,张澜等民盟负责人到香港,他继续给予支持和帮助。

1950年初,吴晋航从香港启程回北京,途径汉口,得到赵忍安帮助,进一步明确了共产党的政策。其时,和成银行各地经理会议于汉口召开,决定将各行内外账目悉向当地人民银行申报。5月,吴晋航向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南汉宸陈述和成业务情况,表明愿为新中国服务的意向。8月,应邀参加在北京召开的金融会议。会后,和成银行即申请公私合营。1951年9月,参加联营联管;1952年进入全业合营。吴晋航任公私合营和成银行副董事长,同时任公私合营民生轮船公司副董事长。

1950年,吴晋航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曾先后任民建一、二届中央常委,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晚年参加文史

资料工作,以自身经历撰写史料。1965年在北京病逝。

## 彭劭农

彭劭农,又名赞尧,1875年(清光绪元年)生,夹江县人。20岁时中秀才。1905年得官费就读日本宏文师范。留日之初,赞同君主立宪,后因受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留日同学彭金门、侯橘园等人影响,遂由保守渐激进。经彭、侯二人介绍,结识了秋瑾,加入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和“大同社”。

翌年夏,彭劭农接受大同社“联络哥老,准备武装起义”的任务回国。先在上海、江浙一带活动,不久回川任夹江县立小学堂监学,因提倡新式教育,遭地方守旧势力排斥。1907年初,彭劭农应威远县立高等小学堂监督、留日同学刘泌子之邀,任该校教习,不久,同盟会员曹笃、胡馭垓也相继来校执教,他们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并以学堂为掩护,暗中联络地方袍哥首领杨绍南、甘东山等人,欲谋举事。同年夏,彭劭农受聘任重庆府中学堂教习。后赴乐山约集同盟会员彭金门、张孔修、杨耿光等开办“乐屏垦务公社”,借“防夷”为名,向清政府当局请领枪支,招募垦丁,组织屯勇队,建立起300多人的革命武装。1908年,彭劭农

回夹江任视学。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9月,各地相继举行武装起义,彭劭农乃致书张孔修,促其拖出垦场队伍参与起义。不料,张孔修率队路经乐山犇溪时,遭地方民团围攻,损失惨重。10月19日,彭劭农率垦场余部加入周鸿勋率领的“中华国民军”。继后,仍多方奔走于成都、乐山、自流井、重庆各地进行反清革命活动。

民国成立后,彭劭农先后出任犍乐富荣盐场清理委员、西盐榷税官、洪雅县征收局局长等职。因军阀连年混战,政局多变,彭劭农十分厌恶官场中的尔虞我诈,遂弃政经商。1919年举家迁居成都,与人合伙创办“生之纸店”,经营家乡特产土纸,不久因公益银券影响,折本散伙。1921年,又在成都走马街独资创办“三泰长”纸铺,继后迁至东大街,继续经营纸业和手工印刷业,在成都工商界颇具声望。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彭劭农对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极力拥护。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深为



愤慨,毅然投身爱国民主运动。1931年,彭劭农被选为成都土纸业商会执行委员并兼任成都《工商日报》社社长后,他聘请中共党员李亚群、柯介安等人为报社编辑。在李亚群等人影响下,彭劭农逐渐对共产党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在行动上主动参与党的外围组织“集思社”活动,并用“老农”笔名在《工商日报》发表呼吁民主、反帝爱国的文章。继后,彭劭农以经商为名,将“三泰长”店铺作为中共四川地下党的重要联络站,他因此结识了许多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和进步人士,如李云仙、王文鼎、邹风平、程子健、张曙时、张秀熟、廖志高、车耀先、郑伯克、王达非等。共产党对他十分信任,以至将中共四川省委的经费也委托他保管,以“三泰长”名义存放银行,随支随用。一次因银行倒闭,所存党费损失,他悄悄用私款垫赔。在其带动下,他的6个子女,从小受到共产党的教育,为党传送文件、抄写传单、帮助接头,到狱中探望同志,作青年工作等,先后有5个子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支持下,有4人奔赴延安。三女彭为和,在敌人的追捕下辗转颠沛,1941年病逝于延安白求恩医院;三儿彭为工,任八路军总部电台队长,1942年在山西辽县反扫荡战斗中,被日军炮弹击中,与八路军参谋长左权将军同时阵亡。

1936年12月25日,韩天石、车耀先、侯方岳等发起成立成都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彭劭农代表工商界参加了该组

织,不久被增补为常委,并组建了成都市工商界救国会。他在纸业同业公会以及商会中,团结了不少工商界人士,协助共产党做统战工作。同时,彭劭农在经济上无私援助党的事业。抗战期中,由中共地下党主编的《国难三日刊》、《时事新刊》影响面广,发行量较大,纸张十分缺乏,彭劭农即用私人赊销名义独自承担供应任务。1940年,两报遭国民党查封后,有人为他纸本损失惋惜,彭劭农爽快而答:“我赊销是就没有考虑过收回的事,这钱用得正是地方。”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邹风平常到他家,1940年抢米事件后,国民党特务到他家搜捕邹,彭劭农拒不吐实,遭特务毒打,负重伤。

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彭劭农一直受到特务监视,加之因通货膨胀,成都工商业倒闭严重,他被迫将“三泰长”顶给他人,生活极端贫困。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仍然为共产党做了大量的工作,热情照顾和掩护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解放前夕,夹江籍华西协合大学进步学生毛英才(成都十二桥烈士之一)被捕,彭劭农曾多方设法予以营救,未果。

成都刚解放,彭劭农即受中共川西区党委统战部委派,为尽快恢复、整顿成都工商业和筹建工商联作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先后任川西行署商业厅厅长、监察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及成都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四川省工委常委等职。

“文化大革命”中,彭劭农横遭抄家

驱赶,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68年6月22日,因脑溢血猝发辞世。

## 黄锡滋 黄明安(合传)

黄锡滋,名大福,重庆人,祖籍湖北黄陂,1883年5月4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生。父名黄道南,二伯黄道和无出,黄锡滋兼祧两房。黄道和经营匹头,家资富有。

黄锡滋幼入私塾,曾学国画。1895年,黄道和去世,黄锡滋获遗产10多万两白银。他将钱财先存岳父杨文光的商号生息,后自营商业,但颇有亏损。1911年,他开设商号,以陈丽生为掌柜,集正、副股本3·6万两,并从两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凑成天锡生。嗣后扩充业务,以天锡生为母号,在几年间,陆续开设了天锡永、天锡公、天锡福、天厚祥、福兴玉等字号,经营匹头、棉纱、油糖、山货等。天锡生、福兴玉以运销川盐为主,是重庆“四大盐商”中的两家。他还投资杨文光开设的聚兴诚银行,任监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生丝外销增长。黄锡滋集资买进天福丝厂,设立天诚丝号,从商业资本逐渐移向工业资本,谋取更多的利润。

黄锡滋的“天字号”做的是上下货,

当时靠川江水运。为了掌握交通工具,实现自购、自运、自销,1920年他投资30万两银子从事航运,创设了福记航业部。为保证轮船燃料自给,1921年又投资开办了三才生煤矿。从1924年起,相继开办复兴钱庄、裕泰钱庄,还投资于三元祥钱庄,以便周转资金,调动头寸。

黄锡滋的经营活动,遍及工矿、航运、金融和商业,获利甚丰。天锡生、福兴玉经销楚岸,1927年,宁汉分裂,淮盐不能运鄂,盐价暴涨,天锡生、福兴玉运去的川盐,赚到银元40多万,比之投资总额,已超过“利市三倍”,为其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有力基础。

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了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黄锡滋的“天字号”亦受到影响,尤以天锡生、福兴玉经营的食盐为最。时四川军阀恣意加提盐税,加以淮盐大量销到鄂西,川盐处境困难,天锡生、福兴玉亏空颇多。1931年至1932年,黄锡滋赔出近百万元,先后结束了天锡生和福兴玉,收束了“天字号”各店。由于日本蚕丝的冲击,又关闭了天福丝和天诚丝号。尔后,全力从事

航运和煤矿经营。

早在1907年,黄锡滋便已投资川江轮船公司。1920年他创办了福记航业部,初购一艘旧轮“嘉定号”,行驶川江上游的叙泸一线;旋即卖去旧轮,以50余万两银子,先后购造“福沅”、“福来”、“福同”三轮,航行川江下游,获利丰厚。到1928年底,总计盈利31万多两。黄锡滋为了对付军阀势力,牟取厚利,1929年6月,改组福记航业部,独资经营“法商”聚福洋行。该行表面上按照《中法商约》,由法商吉利洋行投资1/3,以法国人沙礼出任法方经理,是“中法合资”公司;实则黄锡滋与吉利洋行暗签“密约”,声明合资是假,只由聚福每年送给挂旗费3万两,并付给沙礼等人若干钱,对外事务则由法人出面交涉。聚福凭借洋人的庇护,10多年中,船未搭过兵差,也不完纳捐税,掠取了难得的厚利。抗战初期,聚福积累现金已逾法币300万元。1939年,巴黎吉利洋行总行派吕丹来华,矢口否认“密约”,强要虚设的1/3股权。黄锡滋怕揭穿内幕,只好委曲求全,几经磋商,接受法商补交13万元法币的股本,而被夺去10倍于其投资的利权。

黄锡滋经营的三才生煤矿,在重庆江北静观场戴家沟,1925年正式出煤。随着生产的增进,产煤供聚福自用有余。但一直以土法开采,沿用包工制度,设备简陋,生产经营颇为落后。与此相邻的天府煤矿则掌握控制北川铁路,1938年并入北川民营铁路公司后,更是独占沿

线各矿共有的铁路。在运输上,三才生受到排挤,不得不恢复人力运煤,以至陷入困境。

黄锡滋经商近30年,资金积累到四五百万银元,成为重庆的一大富商。他精通生意,工于心计,善于选择有才干的人负责经营各个企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支持抗日。1938年9月,捐两万元制成棉背心两万件,分送第九战区前方将士,获得国民政府银质奖章和“见义勇为”的匾额。1940年5月8日,黄锡滋因病在重庆去世。

黄锡滋有二子,长明安,次瑾莹。

黄明安,1907年11月20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生。10岁入学,1927年赴上海圣约翰青年中学读书,惧遭绑票,不久回重庆,入聚兴诚银行作练习生。约半年,转入天锡生商号监督内账。1931年天锡生结束后,黄明安在其父资助下,办怡怡公司,开怡丰钱庄。1934年春,黄明安随舅父杨燊三赴欧美考察实业。抗战初,黄经营复华漂鬃公司,任董事长。1940年投资开办光华制革厂。同年7月,黄明安与孔祥熙控制的中国兴业公司达成协议,将三才生煤矿改组成股份有限公司,黄出任常务董事兼协理。

三才生改组之后,进行了一系列扩充,改建了矿内设备工程,产量有所提高,但运输更不适应。1941年3月,乃开工兴建戴黄铁路,翌年5月筑成。但设计欠周,管理不善,所费不貲,通车之后,

仍未完全摆脱依靠天府煤矿代运的局面。由于兴修铁路支出浩大,加以法币不断贬值,三才生改组不久,资金即陷于困境,四处贷款。到1943年下半年,信贷高达两三千万,债台越筑越高。黄明安通过孔祥熙,改组了三才生董事会,获得6000万元长期低息贷款,但仍不能改变其资金困难的局面。再加当时百物昂贵,整个工业陷于停滞状态,影响煤焦的销路,而煤的限价又影响生产,三才生更难以支撑,月月亏累。1944年5月召开两次董监会议,决定迁总公司于北碚黄桷镇,把责任完全委诸黄家弟兄。

这时,三才生已是日暮途穷,成瘫痪状态。黄明安从当年9月起,将三才生由董事陈叔敬全权负责,利用陈和天府

煤矿董事长卢作孚的关系,去和天府商洽合并。天府乃清偿其债务,把三才生合并过去。黄明安经营三才生赔进去二三百万元巨款,受到惨重损失。

1945年复兴钱庄改为复兴义银行,黄明安任董事长。重庆解放前夕,又任强华实业公司代总经理。建国后,黄明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强华公司与华中、合众两家轮船公司合并组成川江轮船公司,实行公私合营,黄明安被任命为副经理。1955年调任长江航运管理局重庆分局副局长。他热心社会活动,参加民主建国会,提任重庆市工商联委员,并当选为第四、五、六届重庆市人大代表。1968年3月11日,黄明安在重庆病逝。

## 温少鹤

温少鹤,名嗣康,回族,1888年1月24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生,巴县人。其父温鹤汀,是伊斯兰教的乡老(会长),又是清秀才,善好诗文绘画,精医术,以行医为业,其家为县中望族之

温少鹤早年就读于开智小学和重庆府中学堂,1911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等二类(理科)。其后,长时间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巴县中学校长,并执教重庆联中、川东师范学校等校。1914年至

1921年被任为巴县劝学所视学,后劝学所改称教育局,任局长。1919年,重庆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他以教育界知名人士身份,被选为分会主要成员之一,积极支持当时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22年至1925年他任巴县教育会会长,对地方教育事之兴革颇有贡献。

温氏家族在早年重庆生丝输出业中颇有名气,温少鹤的四叔温友松,堂兄温希谷均办有丝厂,温友松曾担任重庆总商会会长,故温少鹤的家庭与重庆工商

有较深的关系。当他毕业返渝后,温友松即邀他兼任总商会事务所所长(即秘书),襄办会务,成为温友松的得力助手。在温少鹤的建议和参与下,重庆《商务日报》于1914年4月25日正式创刊,成为重庆早期著名报刊之一。温少鹤继周文钦之后,任报社社长先后达七八年之久。他曾撰文说明发行《商务日报》的目的,在于促进工商经济之发展。在他主持报社期间,代表了工商界的利益,得到商会好评。

1922年,全国总商会在上海召开国是会议,重庆总商会派温少鹤为代表前往参加,事先他征集和整理好重庆工商界对国是的意见,开会时在会上逐一陈述,内容实际,切中时弊,颇为各方注目,得到章太炎、张謇、梁启超、黄炎培等人的奖掖。回渝后,奔走传达,在商界声誉日隆。1923年担任总商会会董,次年被选为丝业公会总董(后改称主席)。1928年当选市商会主席,以后连任多届。当时重庆《新蜀报》在报道市商会选举的新闻中,曾赞誉温少鹤“为人正直,处事公允,物望所归,故在每次商会选举中多得全票”。

温少鹤素抱教育救国之旨,转入商会工作后,仍未稍懈此志。1922年他在上海结识黄炎培后,对于发展职业教育,更有进一步认识,力促商会创办学校,培养商业职业人才。1925年,“重庆市商会私立商业职业学校”开办,由温少鹤任校长,并兼任董事长多年。1932年在他

的倡议下,又创办“重庆市商会私立中学”,仍由他任校长。1934年两校经四川省教育厅核准,定名为“益商职业学校”和“通惠中学”。温少鹤商得两校董事会同意,拨付经费,修建新校址,于1935年建成迁入。两校采用合二为一制,在行政管理上颇具特点。所办益商职业学校,适合当时工商界的需要,每届毕业生,多为各企业所雇用。自创校至1944年,皆由温少鹤主持校务。为推进职业教育,培训商业人才,作出了一定贡献。

在任职商会期间,温少鹤十分重视发展公用事业。1929年他代表商界发起和参与创办重庆自来水公司,被推为该公司监察会副主席。1932年他和赵资生、汪云松等人还共同担负经营自来水管线的实际责任。1943年被推为公司常驻董事,主持日常事务。抗日战争前,他为发展公路交通,曾倡议由市商会筹组“巴县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集资修建渝璧(重庆至璧山)、渝碚(重庆至北碚)两条公路,并购置了一批汽车,行驶七星岗至磁器口一线,他被推为总经理,辛勤筹划,开拓了局面。

1936年,漆鲁鱼在重庆发起组织“救国会”。同年11月,联合其他团体,借市商会礼堂举行“鲁迅先生逝世追悼大会”,温少鹤尽力支持,并参加追悼大会,致悼词。抗日战争时期,温少鹤当选为陪都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946年,他支持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在重庆召开促进

和平民主运动座谈会。1949年11月底，为迎接重庆解放，在中共川东地下党的引导下，出面维持重庆的社会秩序，并根据地下党的指示，采取拖延办法，拒绝了警备司令部逼迫商会交出黄金3000条的勒索。重庆解放之日，他同另外三位工商界人士一道，渡江前往南岸海棠溪迎接解放军先头部队入城。

建国后，温少鹤积极参加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历任民建中央委员及重庆市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市工商联主任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重庆回民文化协进会主任委员、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和全国人大代表等职。1968年7月6日，温少鹤在重庆病逝。

## 萧则可

萧则可，又名萧明成，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生于叙府（今宜宾市）一平民家庭。幼年就读于当地高等小学。因家境贫寒，中途辍学进“万兴鸿锅厂”当学徒。两年后不甘受锅厂老板虐待，弃积从戎。后来感到当兵仍无出路，便离队归家。

1920年9月，萧则可先后邀集王镜初、熊荫村、萧雨笙，次年初，又邀熊郁村，共同集资600两银子，以自己的名义在宜宾林家巷，办起锅铺经营土铁、铁锅、鞋钉、小五金等。并以“勤跑、快销、短转转”的方式循环经营，业务发展很快。

1923年，他们开始代销“美孚煤油”。当时民间照明多用植物油，加之美孚洋灯价高，耗油量，煤油销售极为困难。为打开销路，萧则可派人到鹿蒿坡

璃厂订制各种精美的“省油灯”，运回折本贱卖，这样，卖出一盏灯就增加一用油户，使煤油得以畅销。后来，美孚洋行见萧则可经营有方，便任命他为“美孚油”江安代销经理。继后，又取得“美孚油”在宜宾的经销业务，以及“德士古煤油”在泸州、宜宾的经销业务。逐渐占领了川南宜宾、泸州、江安、南溪、乐山等地的洋油销售市场。

1924年，萧则可放弃过去“跑边江”、“打短转转”的作法，改行商为坐商，于是将原来的单铺面扩为双铺面。取名“宝元通”，自任经理。除经营原来的业务外，还兼营布匹等百货。1925年，萧则可又在南溪、江安、泸县设立分号，先后在成都、重庆、万县、宜宾、泸州、乐山等县设立分店，并陆续延聘人才，招收见习生，自任总经理。

1930年,萧则可在宜宾大北街修起三楼一底的“宝元通百货商店”,以经营百货为主。他提出“以经营百货贸易为过程,发展生产事业为目的,服务社会为宗旨,便利顾客为前提”的原则。在经营方面,讲求信誉,明码实价,童叟无欺,保质保量,包换包退。“宝元通”以其在西南的信誉取得上海、天津、青岛许多厂商的产品经销权,并获得价低和延期付款的优惠条件。同时坚持定价灵活多样,大宗商品薄利多销,一般商品平价快销,紧俏商品高价慢销,过季、呆滞残缺商品削价推销,经销商品低价竞销。且对新进产品,采取少量进货先行试销。由于他们购销对路,服务质量好,重信誉,业务日益扩大。

为了扩大业务,争取市场主动权。1935年,萧则可将“宝元通”总管理处迁往重庆,并与天津、北京、上海厂商签订代销合同,实行产销“联合”。同时参加中国国货联营公司,与中国银行等行办理押汇、抵押贷款,实行“联合经营”。继后,又发起组织合众轮船公司,与川南锅商、綦江东源铁矿组成“联一公司”,实行“以销定产”、“产运销联合”,萧则可任“联一公司”业务董事长。为开拓重庆百货批发市场,还建立了“三三产销协进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地区沦陷,上海运输中断,物资奇缺,物价猛涨,经营倍加困难,萧则可采取“以循环推进保值,以保值加速循环”的经营方

式。同时,开办了宜宾“宝星”一厂,重庆“宝星”二厂、三厂,成都“宝星”四厂,泸州皮件厂,宜宾食品作坊,云南昆明、下关茶厂,并投资合办面粉厂、钢针厂、重庆大川实业公司等工业企业。又于1943年在印度加尔各答成立了“宝元通印度贸易公司”,经营印度麻袋和出口生丝。

抗战胜利后,为了进一步发展民族经济,建立适应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办法,萧则可于1946年5月将“宝元通”改组为“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继续领导各分支机构业务、组织等工作,同时积极往长江下游沿岸大城市方向发展。相继在南京、上海、香港等地设立分公司,建立“经济情报网”。还实行“劳资合一、利益一致”的原则,吸收职工入股,增强职工为公司谋利益的积极性。

解放战争初期,“宝元通”已发展成为在西南地区 and 国内外部分城市设庄、开店、办厂,经营百货贸易,从事生产事业的大型企业。在国民政府重税和通货膨胀的夹攻之下,“宝元通”的业务经营遭受重重困难。加之,国民党统治区动荡不安,人心惶惶,“宝元通”内少数股东要求退股,企图分光财产,部分职工也要求退职,“宝元通”面临破产停业的境地。“宝元通”往何处去?在好友及进步人士的影响下,萧则可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决定与共产党合作。

建国后,萧则可将“宝元通”的店号、工厂以及资产和职工交给国家,向人民

政府输送了一批熟悉业务、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干部。他自己则为发展新中国国民经济献计献策。

四川省人民政府成立后,萧则可先后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省财经委员

会委员,还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四川省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工商联第一、二届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常委等职。1968年冬,萧则可病逝成都。

### 康心如

康心如,名宝恕,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生于绵阳,祖籍陕西城固。祖辈世代宦宦,父康寿相历任四川彭县、什邡、梓潼等地知县,因倾向维新变法,故支持四个儿子接受西方科学民主的新教育。1906年康心如考入成都客籍中学堂,其时长兄康心孚已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经常写信向他灌输民主革命思想,并寄给他《民报》、《革命军》、《黄帝魂》等书报,要他推销。1907年康心如退学后在成都开设粹记书庄,并在重庆设立分社,用以推销革命书刊,便于与革命党人接触。

1911年春,他离川去上海,由其兄介绍加入同盟会。随即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攻习政治经济专科。同年夏,因奔父丧由日返蓉。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奉派与同盟会员李哲夫、饶伯泰等在成都筹设“中华民国联合会四川分会”。次年创办《公论日报》,同时又与友人汪象孙、李澄波及胞弟康心之等在成都创刊《国民公报》,宣

传国民党主张。《公论日报》派他为驻沪特派访员,到上海后,他先后任民立图书公司、进步书局及上海浚川源银行经理。又创办《雅言》,进行反袁世凯独裁专制宣传,仅出11期,当局即以“违宪叛国”为由迫其停刊。

1915年2月,康心如在于右任支持下,与张季鸾、曾通一、朱镜宇等在上海创办了《民信日报》,自任经理,公开反袁。1916年袁世凯死后,该报迁北京继续出版。康如如在国务院侨务局任佥事,兼任上海《新闻报》、重庆《新蜀报》访员。是年9月,张季鸾在京创刊《中华新报》,作为国民党政学会在京的舆论阵地,康心如任该报经理兼编辑。该报因揭露段祺瑞政府签订卖国的满蒙五路大借款被封闭,他和张季鸾同时被捕,关了近一年才被释放。

经此挫折后,康心如对从政生涯产生厌倦;加以其兄康心孚于1919年病故,家庭生活重担落在他的肩上,靠典当度日,便决心“不做官、不入党、不办报”,



弃政从商,另谋出路。

1922年4月10日,经康心如从中撮合,重庆大盐商邓芝如等与上海美丰银行总经理雷文在重庆设立的中美合资四川美丰银行正式开业,总资本额为25万银元,美股占52%,华股占48%,由雷文任总经理,另一美国人任经理,邓芝如、康心如任协理。

同年雷文来重庆整顿业务,接受康心如改革建议,业务大有好转,康从此获雷文信任。这一时期,美丰银行获利最厚的业务是发行“美丰券”,康心如采取各种宣传方式竭力抬高美丰券的信用,并由大生、金盛昌、恒泰等几家钱庄推广使用,流通川、云、贵等省,最高发行额曾达150万元,比资本额增加了5倍。

1926年万县“九五惨案”后,雷文调走银行大量资金,并令美方经理将一切现金、账册、文件封存,严加冻结,迅速撤离。康心如当机立断,依靠刘湘,由其部属和商帮凑集现洋13万元,将美国资本全部收买,1927年4月,完全华资的美丰银行改组成立,康心如出任总经理。

刘湘大力支持改组后的美丰,康心如深受刘湘器重,1930年被聘为刘湘军部顾问,兼财政设计委员会委员。此后又被聘任为二十一军整理重庆金融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主席,粮契税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四川地方银行理事等职。刘湘公开发出布告,支持发行美丰券,在所属防区内当现钞行使。康心如亦参与刘湘重要财经决策,全力支持刘航琛发

行各种债券,由“美丰”担负主要承销任务,以充裕刘湘财源。由于经济情报灵通,“美丰”获利极大。此外,他还利用刘湘势力,通过重庆证券交易所,大赌申汇。1936年与川盐银行等合组利济财团,经营鸦片生意,累获暴利。几年之中,“美丰”分支机构已扩展到34处,并在1935年耗资49万多元,修建了当时重庆首屈一指的建筑——美丰大楼作新行址。

1935年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后,康心如极力取得国民政府的支持,继续扩大“美丰”业务。他向国民政府官营银行大量领钞,从中获取巨额收益;又广为吸收存款,加强翻汇业务,使资金积累大为加快,由原资本25万元,增为300万元。康心如本人资本由1.2万元增为66.7万余元,加上各种对外投资,他已拥资百万,再加康心之、康心远的投资,康氏三弟兄共占“美丰”资本总额37%以上。康氏家族成为重庆著名财团之一,康心如亦以重庆金融巨子著称,1937年被选为重庆银行公会主席。

随着财富的剧增,康心如仿照日本三井、三菱财团扩展业务的经验,开设子公司和投资各种重要企业,向建立垄断企业的方向发展。1939年他先后组设了经营进口业务的德丰公司和兆丰公司,经营出口业务的宝丰公司,经营房地产业务的华丰公司,经营农副产品业务的新丰公司,经营运输业务的群丰公司,以及永成银行、大夏银行、益丰公司等,

初步建立起“美丰资本系统”。与此同时,他还投资于重庆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民生轮船公司、华西兴业公司、四川水泥厂、四川绢纺厂、中国毛纺织厂、天府、东林煤矿公司等工矿、交通、公用企业共 90 多个单位。此外,他还在张季鸾、程沧波等人支持下,在重庆创办《国民公报》,捐助几个私立学校的助学金,开办复旦中学,捐修南开中学图书馆。他还和钱新之、张肖梅等发起组织西南实业协会,协助发展西南各地实业。1940 年他被国民政府选任为重庆市临时参议会首届议长,并蝉联两任;他献议定重庆为陪都,被国民政府采纳。

康心如一向恪守信用,以“一诺值千金”作为“美丰”行训,在业务往来中遭受亏赔,坚决践约。他自称其处世哲学是:“宽和对人,从容办事,忍耐待时”,在重庆银行界中以“善结人缘”著称,工商界称他为“泥水匠”,指其善于折中调和,搁平抹光。

抗战胜利后,康心如对时局极表乐

观,大力开拓业务,并赴美国、加拿大考察业务,准备大展抱负。但由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国统区财政枯竭,金融紊乱,民生凋敝,百业萧条,“美丰”业务一蹶不振。重庆解放后,康心如留居重庆,继续经营“美丰”。由于社会已发生根本变革,“美丰”原有那一套经营已不适应新社会需要,业务继续亏折,乃于 1950 年 4 月自动宣告停业,结束了“美丰”28 年的经营史。

建国后,康心如曾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庆市一、二届人大代表,市人民政府委员,市民建、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四川省、重庆市政协委员。他拥护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尽力协助完成税收任务,安置批发商转业,还建议筹资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被任为重庆市投资公司经理。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身后得到改正。1969 年 11 月 16 日病逝于北京。

## 侯策名

侯策名,又名天府,贡井(今属自贡市)人,生于 1886 年(清光绪十二年)。其父侯春山为菜农。侯策名幼时读私塾 7 年。14 岁时,到淮源井当学徒,拜掌柜姚吉甫为师,3 年师满任帮账(出纳)。

后辞职在太原轩茶馆管账,不久又在荣县乡场从事短途贩运。1916 年在岳父黄兴顺帮助下,凑集白银 300 两,与绸缎庄掌柜朱荣煊合股在自流井开设“利丰原”(匹头杂货店),因亏欠,1921 年停

业。此后,又与人合股开设“益记钱庄”,经营存放款业务。旋将钱庄改组为谦信运盐号,自任经理,经营重庆、江津运盐业务,同时利用自贡借贷利息低于重庆的有利条件,兼营汇兑,从中获取厚利。后因重庆代理商卷款潜逃,使他蒙受巨大损失而停业。

1925年,贡井老盐业世家胡元和的继成井财务周转不灵,侯策名应聘担任该井大关(管财务的柜房)“带肚子”(自备周转金)掌柜。后又与陈仿陶、刘体泉等集资组建“达记钱庄”,凡其租佃产业,甚至继成井大关原料货物供销、银钱流通均由该庄贷放收纳,按现金结算付息,获利甚多。

1927年前后,胡元和家族煎烧的180余口天然气井灶因经营不善,销路疲滞,负债累累陷于瘫痪,胡氏决定出租同新视。侯策名探得这一消息后,抢先于陕商承佃了同新视。后盐价猛涨,他与伙友获利甚丰,加之有“达记”钱庄作靠山,原料产品均为贱买贵卖,利润倍增。不久即购买了胡氏的全部产业,取得了盐业新家族的地位。

侯策名在商场崭露头角后,极重信誉,深得商界好评,1930年被选为自贡商会会长。同年他设立兴利盐号,与运商郑光荣合办运销。次年以商会会长身份,妥善处理了大场商王和甫去世后仲兴祥的债务纠纷,付佃价2000元,接受了王氏14口火圈(加预佃一口),更名天德昌灶。他与伙友将同新视与王氏嘱其

代办的源昌视合并,改名源新视,与王氏各占一半股份。后又用四川盐运使王瓚绪从公益费中拨出的场商减产津贴20万元,开办为场商收支周转服务的裕商银行,任经理(后兼董事长)。他通过裕商收买井灶股份,扩大达记钱庄业务,称霸盐场,拥有井灶日份近百口,陆续租佃火圈120余口。

从1932年起,侯策名同其弟侯性涵与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等开办葆贞井、蕴贞井、蔚贞井、载福井,天咸井等,均获成功。葆贞井火力旺盛,出火230口,成为其合资经营的王牌。天咸井日产卤水数万担,为全场产量及咸量第一。侯氏弟兄占三井火圈60口,占天咸井锅份10天,收买小股后,成为该股伙主要股东。这些产业开办后,正值抗战增产增销的好时机,他迅速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成为巨富。为与淮盐争夺楚岸市场,他早在1936年即与罗筱元、熊佐周等共组“钱福湘”盐号,运盐到宜昌、沙市、湘西等地,与淮盐竞销。后又同大盐商余述怀、刘瀛州接办重庆四川建设银行,任董事长。1942年,他佃得渝商汤氏同兴井火灶40口以后,火力猛增,遂接办福苑井等黑卤井日份,水火相济,产量倍增。为了保证井灶所需原料器材的供应,他设仓储存,除自用外,还转手谋利。对紧缺燃料煤炭更是全力采购,堆积如山。在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年代,他的储物保值办法,曾使他获益不少。抗战期间,侯策名已发展成为自贡

举足轻重的新兴大盐商之一。

1945年后,自贡盐场进入衰退期,侯策名与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颜心畬等,为避免生产萎缩,集资筹组四川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赴美国购置真空制盐设备,以发展生产,扩大运销口岸。终因缺乏外汇、加之货币贬值而遭挫败,公司随之解体。此后受恶性通货膨胀打击,侯策名因减产滞销陷入困境,至解放前夕,已资不抵债,濒临破产。

侯策名在担任自贡蜀光中学董事期间,扩建校舍,出资建立“策名奖学金”,延聘优秀教师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为市立医院捐修一幢三层楼房,为荣县私立存仁中学募集基金100万元。他还保

护和营救了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并支持儿子投身革命运动。

建国后,侯策名主动将用巨资新建的“涵苑”住宅卖给盐务局作办公室,并将售房款3亿元(旧币)投入盐业生产。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他捐献巨款,并带头认购公债。1954年率先申请公私合营,在新组的建华制盐公司任副经理。后历任四川省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自贡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四川省委常委、自贡市委主任委员,四川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1977年1月20日,在自贡逝世。

## 潘昌猷

潘昌猷,号文义,仁寿县人。1901年1月10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出身于一个农家庭,早年在家乡就读私塾。1924年,到成都向其兄潘文华之同学、时任四川督理的杨森求职,被委任为成都外东统捐分局局长。不久,杨森在军阀混战中下野,潘昌猷回到仁寿老家。1925年去重庆,在其兄师部当军需,后代理军需处长。1928年潘文华任重庆市长,潘昌猷为市金库主任兼市奖券所所长。奖券所发行“市政公益奖券”,他从中挪用了不少钱,与人合伙开

设中孚钱庄,从此进入金融界。

1931年潘文华下令开设重庆市民银行,官商合办,潘昌猷在其兄扶植下,代表官股任董事兼总经理。鉴于不懂银行业务,他延揽内行分别担任襄理、会计主任、营业主任等;又开办商业补习学校培训班底,并亲自到校听课,学习银行业务知识,还虚心向行家学习经营管理经验。经过潘昌猷一番努力,市民银行业务逐渐开展,连年获利,在重庆金融界站住了脚;加以市民银行享有发行辅币的特权,使潘昌猷声望日增。1934年当选

为重庆市银行公会主席,接着被选为市商会主席,还担任重庆市立中学校长。在此期间,他以透支方式将自己名下的虚股30万元购为已有,所占股额达60%以上。以后银行增资,他如法炮制,遂至拥有股额80%以上,并在潘文华的支持下,改组市民银行,收买了全部官股,于1934年8月29日将“重庆市民银行”改为“重庆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成立初期,资力并不雄厚,而潘昌猷投机心切,大赌公债,大量购进国民政府所发行的“统一公债”。1937年“七七”事变后,“统一公债”价格惨跌,重庆商业银行亏累甚巨,陷入严重危机。

1938年1月刘湘去世,潘文华支持王缙绪继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是年6月,王委派潘昌猷为四川省银行总经理,以相酬谢。潘昌猷利用省行低息贷款搞活商业银行,王缙绪十分眼红,指派其心腹军需处长郭松年为省行董事长,改行董事长责任制,使潘昌猷有职无权。1939年9月,王缙绪下台,蒋介石兼四川省政府主席,要财政部长孔祥熙拉拢四川实力派军人,孔与潘文华换帖订为兰交,潘昌猷由此得到孔的垂青和照顾。1940年,财政部投资200万元,改组四川省银行,指定潘昌猷为董事长。从此,潘再度掌握省行实权,达8年之久。其间,他以“同业借款”名目,从省行套取大量资金转入重庆商业银行,数额逐年上升,从1938年平均每月7万元,增至1945年平均每月3000万元以上,并凭借孔祥熙

的关系,获得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金局的贷款。潘昌猷用这些资金从事黄金、美钞、外汇和房地产的投机活动,利用通货膨胀,大发其财。到1949年,净赚黄金7520两、美金170万元,房地产银元120万元。

潘昌猷还以大量资金经营工商企业,他所经营的崇德进出口贸易公司,专营猪鬃出口,与古耕虞的四川畜产公司、康心如的宝丰进出口贸易公司、刘航琛的和沅实业公司,并列为重庆的“四大公司”。重庆盐号也是他经营的重点企业之一。抗战胜利后他将总号迁往上海,于连云港、长沙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把经营范围由川盐扩大到海盐、淮盐。他开办的植华纱厂,选派人员到美国学习纺织技术和经营管理,并向美国、香港订购生产设备。据统计,潘昌猷所经营与投资的公司、厂矿,包括重庆比较著名的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公司、华昌煤矿、庆华轮船公司、华陵化学公司等共有152家。上述各家,均由潘昌猷担任董事长、常务董事或总经理等职。他还以其在金融、工商界的地位,担任了重庆市参议员、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职务。

潘昌猷在重庆期间,与张澜、李济深、章伯钧、郭沫若等知名人士有交往。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曾参加毛泽东在桂园举行的茶会。解放战争后期,潘昌猷鉴于国民政府的崩溃逐步把资金向海外转移。1949年秋去香港,对李济

深、张澜等的民主活动有所资助,并以黄金 100 余两交中共党员夏逊转交中共四川地方组织作活动经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昌猷于

1950 年 1 月回到北京,同年冬,托词清理外汇赴香港。临行前,对抗美援朝战争有所捐献。1953 年由香港去巴西里约热内卢定居。1981 年 1 月 2 日病故。

